ANOTHER BROOKLYN

A Finalist for the 2016 National Book Award



Tennessee • ⟵⟶ • Brooklyn

另一个布鲁克林

[美] 杰奎琳·伍德森——著
张维营——译

Jacqueline Woodson

★★★★★

2016年亚马逊选书TOP20
2016年纽约时报畅销书
Goodreads2016年选择奖小说类TOP15
2016年BuzzFeed选书TOP24
全美有色人种协会形象奖杰出文学作品提名
2016年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推荐图书

你也许没有从田纳西州到布鲁克林的经历，
但你一定也曾离开家乡，只是想去更广阔的地方。

这本书将全世界小镇青年的乡愁一网打尽
关于漂泊与回归，获得与失去，责任与自由

201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最终决选作品

★★★★★

我曾为梦远行，终成回不去的异乡人。

中信出版集团

ANOTHER

版权信息

书名:另一个布鲁克林

作者:[美]杰奎琳·伍德森

译者:张维营

ISBN:9787508679389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怀念布什维克[注]的岁月（1970—1990）

一切已成记忆

---

1. 布什维克：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北部的一个工人阶层社区。——编者注

沿着这条街区一路向前，然后右转，你会看到一树桃花正在盛开。

——理查德·赖特[注]

---

1. 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美国黑人作家，作品反映美国贫富悬殊、种族歧视问题，代表作有《土生子》等。——编者注

1



在母亲去世前的一段漫长时光里，我的故事原本可能更加悲惨。我父亲本可能变成酒鬼，或是染上毒瘾，抑或沉迷于女人，抛下我们姐弟俩，任我们自生自灭——或者比这更糟——把我们丢进纽约市儿童服务中心，父亲说过，凡是被送去那里的孩子大都没有好结局。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所谓悲剧，不在于当下，而在于回忆。



如果那时就听了爵士乐[注]，我们的人生是否会变得跟现在不一样？如果早就知道我们的故事是一曲回旋往复的蓝调，不断重复同一段副歌，我们是否会抬头，对彼此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就是记忆”，直到生活变得有意义？如果早就知道那疯狂的青春里嵌着一段旋律，现在的我们又会在哪里？当年呀，西尔维亚、安吉拉、琪琪还有我，四个女孩聚在一起，像极了爵士乐的即兴演奏——头几个音符试探着相互靠拢，渐渐地，乐队找到了相同的步调，音乐随即自然而然地流淌起来——可惜，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爵士乐，也无从知道自己就像一首爵士乐歌曲。20世纪70年代最流行的那四十首歌曲都在试图诉说我们的故事，却从未真正把我们说清。



十五岁那年夏天，父亲把我带到了一个女人面前。那女人是他在伊斯兰民族组织[注]的兄弟介绍认识的。他说，这位女士受过教育，我有什么话都可以跟她说，因为那时候，我几乎总是缄默不语。在那之前，曾经口齿伶俐的我突然变得沉默，像是被夺走了呼吸，陷入了一种令家人不解的忧愁之中。

索尼娅女士瘦瘦的，她棕色的脸蛋严严实实地遮掩在黑色的头巾下。从那以后，这个戴着头巾、手指纤细、黑色眼眸里闪烁着疑问的女人就成了我的治疗师。但那时，也许已经太迟了。

“谁还没经历过一些沟沟坎坎呢？”索尼娅女士经常这样问我，似乎理解了人类的苦难是如何之深、如何无所不在就足以将我拉出自己的泥沼。



不知何故，我和弟弟的童年有一半都是在没有母亲的环境中度过的。弟弟有父亲传承给他的信仰，而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西尔维亚、安吉拉、琪琪一起分担着在布鲁克林成长的女孩们的重负。它沉甸甸的，仿佛一袋重石，当我们无法承受时便互相传递，说着：“来，帮我背一下。”



转眼间，那段童年时光已逝去二十年了。今天早晨，我和弟弟安葬了父亲。我们肩并肩，站在墓地里，四周的柳条低垂着，积雪融化，仿佛在泣泪，在冰雪的映衬下显得光秃秃的。清真寺的兄弟姊妹围绕在我们身边。在清晨的银光下，弟弟伸出手来，握住了我戴着手套的手。

之后，我们来到新泽西州林登市路边的一个小餐馆里。弟弟脱下了黑色外套，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和黑色羊毛西裤。他头戴妻子织的黑色小圆帽，帽边正好抵到眉梢。

餐馆里散发着咖啡、面包和漂白剂的味道。霓虹灯闪烁着明亮的绿光，打出“欢迎惠顾”的字样，下面垂挂着积满灰尘的银色彩条。圣诞节那天我是在医院度过的，看到父亲呻吟着要止痛药，而护士却迟迟不来。

一位服务员为弟弟的薄荷茶续了些热水。我挑挑拣拣地吃了几口鸡

蛋和温热的家常炸薯条，故意慢慢地咀嚼着嘴里的肉逗他。

“你还挺得住吗，老姐？”他问道，深沉的声音有点颤抖。

“我很好。”

“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哦，我懂了，你还在吃‘魔鬼’的食物。”

“什么都吃，不带一点咕噜声。”

我们大笑起来，这是一个老笑话——从前，我常常跟闺密们在下午一起偷偷溜去街角的杂货铺，去买我在家里不准吃的食物。

“知道吗？你还是可以过来跟我和阿拉菲亚一起住的。睡几个晚上可不会传染。”

“我在公寓里住得挺好，”我说，“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整理爸爸所有的遗物……阿拉菲亚还好吗？”

“她会没事的。医生说得好像她一站起来宝宝就会马上从肚子里掉出来一样。一切都很好，宝宝也会平安无事的。”

七月三十日，我开始了进入这个世界的征程，然而直到八月我才真正降临人间。我的母亲饱受漫长分娩的折磨，当她问今天是几号时，父亲回答说：“八月了，现在八月了。”“嘘——亲爱的，”他低声说，“我们的奥古斯特[注]出生了。”

“你害怕吗？”我问弟弟，握住了他放在桌上的手。脑海里刹那浮现出我们在甜蜜林小镇的一张合影：我把刚出生不久的弟弟抱在大腿上，

自己也还是个小女孩，冲着镜头微笑，神气十足。

“有一点儿。但我知道，有真主安拉在，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安静地待着。周围都是白人老夫妇，他们小口喝着咖啡，两眼放空。我听到身后有人用西班牙语说笑着。

“我才这么年轻就要当姑姑了。”

“你要是再不着急，就会老到当不成妈妈了。”弟弟咧着嘴笑，“我可没有批评你的意思。”

“没批评才怪。”

“我只是想说，你该停止研究死人，回来跟你活生生的老弟混了。我认识个男的……”

“别跟我提这个。”

我试图不让自己去想即将独自一人回到父亲公寓的事，那伴随死亡而来的如释重负以及深深的恐惧。要把衣服捐出去，把过期的食物扔掉，把照片收起来，可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谁？

在印度，印度教徒把逝者火化，将骨灰撒在恒河的水面上；巴厘岛附近的加比德尼奥人(注)把死人放进树干里；父亲则要求我们把他土葬。他的灵柩躺在土坑里，一堆颜色深深浅浅的黄土静候在一旁。我们没有站在一边，看着这堆黄土被铲到他身上。我总是忍不住去想，父亲会突然醒来，在柔软无形的缎衣中挣扎，就像其他成百上千个人一样——在深度昏迷中被埋葬，醒来恐惧地发现自己已身在地下。



“你打算在美国待一段时间吗？”

“就一小段时间，”我说，“但是我很快就会回来看宝宝的。我不会错过宝宝的出生。”

小时候，我并不知道“人类学”这个词，也不知道有个组织叫“常春藤联盟”。我更不知道有人可以生活在飞机上，穿梭在世界各地，研究死亡，目睹前世今生的未解之谜……最终获得了解答。我曾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在毛里塔尼亚和蒙古见过丧葬习俗。我见过马达加斯加人从墓穴中挖出用棉布包裹着的先人尸骨，给它们喷上香水，请求这些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先人告诉他们过去的故事，祈求他们的保佑和祝福。我曾在家待了一个月，目睹了父亲的死亡。死亡并没有吓倒我，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然而，布鲁克林于我却似骨鲠在喉。

“你应该快点来阿斯托里亚(注)吃顿饭，吃顿干净的饭。阿拉菲亚可以坐下来一起吃，只是不能站在炉灶旁做饭。我会安排好的。一切都没问题。”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念爸爸，也想你了。”

在父亲得了肝癌之后那段漫长而痛苦的日子里，我和弟弟轮流照顾他。弟弟晚上来医院接我的班，早晨我过来叫醒他，好让他回家赶紧冲个澡、做祷告，然后去上班。

此刻，弟弟看起来仿佛从三十一岁回到了七岁时的模样，浓浓的眉毛向下垂，皮肤是那么干净光滑，简直不像个成年男人。

我想安慰弟弟。“其实这是好事，父亲他……”但欲言又止。

“安拉慈悯，”他说，“感谢安拉召唤父亲归真。”

“感谢安拉。”我说。



弟弟开车把我送到了地铁站，亲吻了我的额头，然后用力地拥抱了我。不知从何时起，他已经成长为一个男人了。那么久以来，他一直都是我的弟弟，既可爱又严肃，眼睛睁得大大的，窥探着这个世界。而现在，戴着一副小小金丝眼镜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从历史书里走出来的人，好像是马尔科姆[注]，或者是斯托克利[注]。

“我会在后天之前过来帮你，怎么样？”

“我自己能行！”

“什么？你难道藏了个男人不想让我见吗？”

我笑了。

“我敢打赌，你一定还在做坏事。”

我拍了他一巴掌，下了车。“爱你。”

“我也爱你，奥古斯特。”



在回旧公寓的地铁上，我抬起头，惊讶地发现西尔维亚竟坐在过道对面读着《纽约时报》。从上次见面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岁月让她越发美丽。棕红色的头发剪短了，卷卷的，夹杂着灰发。她的皮肤依旧是那种不同寻常的古铜色，衬托出一双浅色的眼睛，而今眼角已刻上了丝丝细纹。也许是感受到了我的目光，她突然扫了我一眼，认出了我，微微一笑。在那几秒钟的时间，时光倒转，她仿佛又变成了当年的西尔维亚：快满十五岁的她穿着圣托马斯·阿奎那中学的校服——蓝绿相间的格子裙、白衬衣，戴着格纹十字领结，肚子已经开始微微隆起。当沉默再次占据了我的身体时，我想起了索尼娅女士：她戴着黑色头巾的脑袋，看着笔记本，我第一次在她办公室里哭诉时，她停住了笔。

“西尔维亚。”

“哦，天哪！奥古斯特！”她说，“你是什么时候回到布鲁克林的？”

她的孩子现在应该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了。我记得听人说过，她有着西尔维亚棕红色的头发，而且刚出生的时候，眼睛是灰色的。

冥冥之中，我知道列车正在驶入亚特兰大大道站，然而车站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离我很遥远。不由自主地，我从座位上站起身，又一次失声，身体开始化为尘埃。

也许西尔维亚以为我要走向她，准备拥抱多年不见的老友，然后忘记曾经的一切。也许她已经忘记了，时光抹平了记忆。

“你看起来很不错啊，姑娘。”她说。

列车门开了，我还没到站。

但我还是下了车。



岁月抹去了我们的人生。西尔维亚仿佛又退回到我认识她之前的那个世界，消失在尘埃之中。她的宝宝不见了，然后是她的肚子、她的胸部，最后只剩下那道她在我生命里留下的巨大鸿沟。

下一个消失的是安吉拉。这些年来，她仅仅是我在放假回家时，在电话答录机上听到的微弱声音。“我刚听说了琪琪的事，糟透了。你在听吗？”说好下次我俩都在纽约时再联系，说好她会再来找我。然而，我们那些因相隔太远而互道的谎言是如此空洞，她还是退回到她的世界，一个由舞者和演员构成的世界——重回上流社会，不带任何过往。

“琪琪。”

每个星期，索尼娅女士都会说：“从头讲起吧。”她深色的手指握着一个小小的黑色笔记本，笔悬在空中。许久之后，我才开口说话。每周，我都以这句话开头：“我在等妈妈……”

她的办公室很小，常春藤像瀑布一般从小花盆里倾泻下来，垂落在原本光秃秃的窗台上。也许正是常春藤让我不停地回到了那里。每个星期，我都会在那儿待上四十分钟，目光从常春藤移向索尼娅女士的黑头巾，又移向她握着笔记本和钢笔的手指。之所以和她说话，也许只是因为每个星期我能望着一张棕色的、有棱角的女人的脸，再次相信母亲很快就会回来。

我知道当我到那儿的时候，我和弟弟过去常唱这首歌，我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将会是金灿灿的太阳，金灿灿的阳光正好洒落在我的身上㊟*……*

我怎么会去那儿？会被人要求“从头讲起”？我究竟变成了什么样？

“她就要来了，”我说，“明天，或者下个明天，或者下下个明天。”

“你的朋友们呢？”索尼娅女士问，“她们现在在哪儿？”

“我们在等琪琪，”我说，“大家都在等琪琪。”

西尔维亚、安吉拉、琪琪和奥古斯特。我们四个女孩在一起，美丽动人却孤独无依。

这就是记忆。



在东印度尼西亚，人们把死去的亲人安置在家中的一个特殊的房间里，直到攒够钱举行葬礼，死者才算真的逝去。但在那之前，死去的亲人会一直和家人住在一起，家人每天早上给他们穿衣，照顾他们，带他

们一起出门，每天拥抱他们，深爱着他们。

---

1. 爵士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诞生于南部港口城市新奥尔良，音乐根基来自蓝调（Blues）和拉格泰姆（Ragtime）。爵士乐讲究即兴，以具有摇摆特点的节奏为基础，是非洲黑人文化和欧洲白人文化的结合音乐。——译者注
2. 伊斯兰民族组织（The Nation of Islam，简称NOI）：一个非裔美国人的宗教组织，在民权运动中有着突出表现，其成员有很多都是黑人穆斯林。——编者注
3. 奥古斯特（August）：意为八月。——编者注
4. 加比德尼奥部族（Caviteño）实行树葬，他们认为，树木给了人生命中所需的一切，所以人死后应该把尸体奉献给树木。——译者注
5. 阿斯托里亚：纽约皇后区西北角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译者注
6. 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1925—1965）：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崇尚暴力革命，号召美国黑人信奉伊斯兰教，遵照先知的圣训求得解放；为争取黑人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与南部的马丁·路德·金并称为20世纪中期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黑人领袖。——译者注
7.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1941—1998）：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提出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黑人民权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口号之一——“黑人权力”（Black Power）。——译者注
8. 这几句歌词出自美国歌手卡洛尔·金的歌曲《遥远的地方》（*Way Over Yonder*）。——编者注

2



那年，母亲开始幻听，总是听见她死去的弟弟克莱德的声音，父亲带着我们姐弟俩从田纳西州的甜蜜林小镇搬到了布鲁克林。那是1973年的夏天，我八岁，弟弟四岁。在那个炎热的城市里，弟弟又重新开始把大拇指放在嘴里，睁大了眼睛，露出一副怯生生的模样。

我们的小公寓在一栋三层楼的顶层。我和弟弟从来没到过这么高的地方。我们透过房间里被油漆粘住的窗户看着楼下的街区，一看就是大半天。从楼下经过的人都很美，而且各有各的美法——有的苗条，有的丰腴，有的顶着“爆炸头”，有的编着“玉米辫”，有的则是秃顶。他们有的穿着非洲黑人那样明亮花哨的短袖套头衫和喇叭腿牛仔裤，有的穿着迷你裙和吊带上衣。

田纳西州的葱绿色很快淡出了记忆，取而代之的是布鲁克林这个陌生世界中水泥里散发出来的灼热气息。我常常想念母亲，常常会抬起手抚摸自己的脸颊，想象她在身边，为我解释这些新鲜事物，这里快节奏的生活，以及这里难以穿透的灰暗。弟弟哭泣时，我会哄他，告诉他别担心。“她很快就来了，”我努力模仿母亲的口吻说，“她明天就来了。”明天，或者下个明天，或者下下个。



正是在那个夏天，我第一次见到了西尔维亚、琪琪和安吉拉。她们三个从我们的街区里走过，穿着吊带衫和短裤，手挽手，仰着头，放声大笑。我一直看着她们，直到她们在我的视线里消失，好奇她们是谁，她们怎么……如此亲密。

母亲不相信女人之间存在友谊，她说不能相信女人。“张开你的手臂，”她说，“让她们待在你最远的指甲尖以外。”她还让我把指甲留长。

然而，当我看到西尔维亚、安吉拉和琪琪从窗下经过时，内心却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感觉——我渴望成为她们中的一员，跟她们一起那样手挽着手，永远不分开。

一个星期后，她们再次出现了。这一次，她们停在了我家的窗下，解开了一条长长的电话线，把它对折，然后琪琪和安吉拉摇绳，西尔维亚则站在对折的绳子之外，身体不停地前倾又后仰，直到她钻入绳中。我看着她们，微微张着嘴，被她们之间的默契配合所吸引，一个人的动作让另一个人的动作延续下去。

父亲、弟弟和我则完全不是这样的。虽然我每天都跟他们一起度过，但在我的内心，无论是抱着弟弟的时候，还是跟父亲大笑的时候，总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但那是一种阴影里的存在，一种刻在基因里的存在。当弟弟和父亲边说话边不自觉地前倾身体时，我能看到他们之间那种流动的联系，一种置我于其外的联系。也许这也是我与母亲互相靠拢时的样子。当她回来的时候，我们又可以这样说话了。每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会把脸贴在热乎乎的玻璃上，张开手掌贴着窗户，渴望加入西尔维亚、安吉拉和琪琪的小团体。

七月末，父亲拿了一把刀揳入顶部的窗框，沿着厚厚的绿色喷漆槽来回地锯，直到窗框松动，那时我们终于听到了城市的喧嚣声。

不知在街上的哪个角落，有台小收音机整日都在播放《兴风作浪》[注]，有时候弟弟会跟着一边哼唱一边用手指比画：那么我想知道你为何会有这个念头，如我所说你为何……

从七月到夏末，我们透过窗户望着布鲁克林，看着它从清晨一抹令

人心醉的粉红色陷入黄昏时那道令人惊叹的灰蓝色。日上三竿时，我们会看到几辆搬家卡车停在窗下。几个陌生的白人把行李塞进卡车，傍晚，我们看到他们久久地凝望着即将离开的房子，然后爬上旅行车离开。有一个脸色苍白的黑发女人在爬上副驾驶座时用双手捂住脸颊，肩膀颤抖着。

很多时候，只有我和弟弟在家。父亲在市区里的亚伯拉罕与施特劳斯百货商店[注]的男装部工作。每天早晨，天刚亮时他就要出门去赶B52路公交车。我们从来没坐过那路公交，也没坐过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路公交。公交车对我们来说就像楼下大街上那些黑色和棕色皮肤的男孩一样陌生。他们用粉笔在地上画出数字，玩掷瓶盖的游戏，一天下来，双手和膝盖上都是白色的粉笔末。有时候，男孩们会抬头望着我们的窗户，有个帅气的男孩不止一次地朝我眨眼睛。很多年过去了，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一天清晨，我和弟弟一人捧着一碗燕麦粥坐在窗边，看到一个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扳手，撬开楼下的消防栓顶盖，然后拧松栓顶，白花花的水柱顿时喷涌而出，漫向大街。我们盯着水流看了大半天。一群孩子奔跑在水花间，背心和牛仔短裤湿嗒嗒地贴着棕色的皮肤，我们并不认识他们，但突然间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到恨的嫉妒。那天，我又看到了西尔维亚、安吉拉和琪琪，她们在水花中你推我搡，欢笑声飘进了我们的窗户。

“她在嘲笑我们吗？”弟弟问，“就是那个红头发的女孩。她刚刚抬头冲着我们的窗户大笑。”

“嘘，”我说，“她没啥了不起的。”

我开始恨她们。我开始爱她们。

在此期间，安吉拉有时会从其他孩子身边走开，站在一旁使劲儿地

咬指甲，一头爆炸式的短发滴着水珠。对我来说，她那淡棕色的皮肤就像田纳西州一样熟悉。有时候母亲会带我们去一个小教堂，在那里有四个长得很像安吉拉的姐妹坐在前排，挺直了背，拉直的头发编成辫子，系着白缎带。当她们的父亲布道时，我望着她们，好奇距离神明如此之近是什么感觉。她们的父亲常说：“上帝如此爱世人，于是将自己的独生子献给世人[注]。”但他的女儿们呢？我纳闷。上帝会怎样对待他的女儿们呢？



我父亲在布鲁克林长大，十八岁入伍，被派驻在田纳西州克拉克斯维尔附近的军事基地。后来他参加了越南战争，再后来遇到了母亲，搬到了甜蜜林小镇。他的两只手各少了一根手指，左手少的是小指，右手少的是拇指。当我和弟弟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时，他都不肯回答，于是我们会花上很长时间猜想在战争中失去两根手指的一切可能——刀切断的；炸弹炸掉的；老虎咬掉的；糖尿病害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猜测。他的父母就在离我们现在住所一个街区远的地方度过晚年，并在那里过世。那年夏天，我们恳求父亲放我们白天出去玩，他却摇摇头，说：“这个世界不像你们乐意相信的那么安全。看看比夫拉[注]，再看看越南。”

我想起琪琪、西尔维亚和安吉拉手挽着手从窗下的大街上走过。她们看上去是那么强大，那么坚不可摧。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前往父亲为我们找到的小教堂的路上，一名身穿黑色西服的男子拦住了他，说：“我亲爱的黑人兄弟，我是伊利贾[注]派来的，以安拉的名义，给你捎来一则口信。”

那个人看着我，目光在我裸露的双腿上缓缓移动。“你是个黑人女王，”他说，“你的身体是一座神庙，应该遮盖起来。”我攥紧父亲的手。穿着夏日短裙的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两条腿似乎太过修长与赤裸

了。我的身体是一座未上锁的神庙，一座暴露的神庙。

那个人递给父亲一份报纸，说："愿安拉赐你平安(注)。"然后就离开了。

在教堂里，牧师的背后有一幅耶稣基督的画像，他洁白而神圣，敞开长袍，袒露出鲜血淋漓的心脏。

"《诗篇》(注)告诉我们，"牧师说，"在危难中呼唤主，他会回答。"

金色的阳光透过一扇斑斑驳驳的小玻璃窗射进来。父亲抬起目光，看到了我所看到的画面——阳光舞动着穿过折叠椅，掠过一排排大腿，照在变形的硬木地板上。然后，太阳渐渐移动，光线柔化，重陷阴影。在教堂的阳光中，捎给你的是什么口信，我美丽的黑人兄弟？捎给我们的是什么口信？

我身后的一位老妇低声叹了一句"阿门"。



华灯初上时，我和弟弟坐在窗边，可以看到孩子们沿着人行道跑来跑去。我们听见他们一边笑一边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们听见街边的雪糕车放着歌，歌声与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弟弟一次次地恳求到窗外的世界里去。他渴望看得更远，穿过新种的小树，穿过消防栓，穿过变暗的窗玻璃上我们自己的影子。

如果有人在那一刻抬头向上看，就会看到我们俩一如既往地从玻璃窗后观察着这个世界。那年我十岁，弟弟六岁，母亲还在甜蜜林小镇。我们的话语仿佛变成了一首歌，反反复复地唱着：当我长大了……当我们回家了……当我们出门时……当我们……当我们……之后，弟弟用手掌贴着窗玻璃，用力向外而不是向上推，玻璃碎了，弟弟的前臂被割出一道深深的白色伤口，接着变成鲜红色。

父亲是何时突然拿着一条厚毛巾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刚才在隔壁房间吗？还是在楼下？又或者一直在我们旁边？这一切都成了记忆。父亲的嘴抽动了几下却没有作声，弟弟的血流到了窗台边，滴到了我们脚边闪着光的碎玻璃上。救护车闪烁着红色的灯，却听不到声音。父亲抱起虚弱的弟弟，同样没有声音，只留下一条沉默的血迹。救护车无声地呼啸着。人群无声地围拢过来，看着我们三个钻进救护车。一切就像一场无声电影。



在医院明亮洁白的病房里，声音又回到了我耳边，味觉、嗅觉和触觉也都一起回来了。房间好冷，我们还没吃晚饭。弟弟去哪儿了？护士递给我一只装着红色果汁的纸杯和一个盛着尼拉牌饼干的塑料餐盘。我想要水、牛奶、肉。我的T恤上有块干成焦褐色的血迹，短裤上也有，浅蓝色帆布鞋上也有。我把饼干两块两块地叠在一起吃，慢慢地咀嚼。

母亲说克莱德没有死在越南，他们认错人了。“那么多棕色和黑色皮肤的人，谁能分清呢？”母亲说，“那具尸体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他告诉我的。”

另一位护士过来安慰我。

“你弟弟会没事的，”她说，“一切都会好的，亲爱的。”

“克莱德没事，”母亲说，“他很快就会回家了。”

国王郡医院[注]没有单人病房，只有一张张隔开的床。拉开一道帘子，就会看到一个宝宝在哭；拉开另一道帘子，有个女孩高高地悬挂着手臂。一道道帘子，一个个孩子，一个个护士，伴随着各种噪声。我弟弟在哪儿？

“你喜欢这些饼干吗，亲爱的？”护士问道，“你是不是饿了？”

菲律宾北部的本格特省人会蒙住死者的眼睛，让他们坐在家门口的椅子上，绑住他们的手和脚。

母亲不停把玩着手中的电报，面带微笑地盯着房门。



“破窗事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心思顾及西尔维亚、安吉拉和琪琪的近况。当她们在窗下互相喊话时，我没有低头向下看。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灯泡四周环绕着一圈圆形图案，好似灰白色的花缠绕着灯，从茎到花紧紧缠绕。如果母亲要来，她现在就应该来了，来到那破碎的玻璃和弟弟被割开又被缝合的手臂旁边。

当弟弟喊着“那些女孩又来了”的时候，我没有回应。我在袜子里蜷曲脚趾，然后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在绷带底下，一条黑色的缝合线留在了弟弟的手臂上。我想要妈妈。

---

1. 《兴风作浪》（*Rock the Boat*）是美国流行乐与灵魂乐三人组合休斯乐团（The Hues Corporation）最受欢迎的作品。——译者注
2. 亚伯拉罕与施特劳斯百货商店（Abraham & Straus Department Store）：简称“A&S”，创立于1865年，总部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编者注
3. 上帝的独生子指耶稣。——编者注
4. 比夫拉：1967年尼日利亚东部一个由分离主义者建立的短命国家。同年尼日利亚内战（又称“比夫拉战争”）爆发，尼日利亚军政府要求统一，最终比夫拉共和国于1970年灭亡，重归尼日利亚。这场战争造成了近300万人的死亡和空前饥馑。——编者注
5. 伊利贾：指美国黑人穆斯林领袖伊利贾·穆罕默德，他是伊斯兰民族组织的领导人。——译者注
6. 愿安拉赐你平安（As-Salaam Alaikum）：这是穆斯林的常用的问候语。——编者注
7. 《诗篇》是《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书，是一辑受感示的诗歌集。——译者注
8. 国王郡医院：布鲁克林的一家医院。“国王郡”即为布鲁克林区的别称。——编者注

3



在“破窗事件”后不久，父亲开始允许我们出去了。最开始他只准我们走到楼前的大门处——“待在里面，别开门”。接着是街区中央的树旁，后来允许我们走到街角的停车标志旁，然后是拐角处的庞乔杂货铺，但他要求我俩一直在一起。“牵住弟弟的手。”父亲嘱咐道。再后来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步行道、大街、手球场、尼克伯克酒店、街对面的公园、小秋千、大秋千。最终，我和弟弟完全自由了。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在街上漫步，寻找母亲的身影。现在她的头发变白了吗？她还梳着那圆蓬蓬的“爆炸头”吗？她会不会比我记忆中的更消瘦了？还是像那些搬走的意大利女人和爱尔兰女人一样，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发胖？那些女人曾在我们楼下的大街上慢吞吞地走过，有着下垂的乳房和胖得看不见的腰。她是否还会在夜里呼喊克莱德的名字，还会诅咒我父亲，还会走过曾经那片属于她的土地，一直走到湖边，以为那个地方依旧属于她？

“跟我来，”我总是对弟弟说，“我们一块儿去找她。”

在西尔维亚、琪琪和安吉拉成为我的好朋友前，她们每天清晨来到学校，都会离我远远的。她们会隔着操场呼唤对方；她们手挽着手，开怀大笑；她们会在老师转身时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在知道她们叫什么之前，我甚至熟悉她们脖子后面细小的骨头；熟悉她们柔和弯曲的发际线；熟悉她们的每一件小圆领衬衫和高领毛衣。我也熟悉安吉拉在食堂排队等待时皱着眉头的表情；熟悉操场上西尔维亚用古铜色的手臂搂着安吉拉的腰时的样子；熟悉在礼堂里宣誓时，琪琪那一口夹杂着西班牙

式、英式或德式口音的英语。

她们是学校里每个老师的最爱，仿佛我们其余所有的人都成了隐形的。

在她们成为我的好朋友之前，我常常盯着她们的脖子看，在她们跳绳和打手球时观察她们完美的手，看着她们那涂得鲜艳亮丽的指甲。当她们挽起彼此的手臂，蹦蹦跳跳地穿过走廊时，我确信她们从没有经历过“鬼妈妈”[注]。我深信她们稳稳地扎根在这世界上。我望着她们，渴望拥有她们所拥有的一切。就在这里，就是现在。

那一年，我们还没长到一样的个头，西尔维亚是我们当中个子最高的。在我们最终成为朋友的那天，安吉拉穿着一件过小的外套，两条瘦弱苍白的手臂从袖子里露了出来。我自己的夹克也已经不合身了，所以我首先与她对视，希望她能看出来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都把头发编成“玉米辫”，都对这座城市骤然而至的冬天猝不及防。

也正是那时，我心里充满了悲伤和陌生感，它们超越了其他一切的感觉。那年，我十一岁。年龄变成了两个同样的数字，这给了我一种新奇、了不起又心碎的感觉。那几个女孩一定也有同感，她们肯定能理解。我们的七岁、八岁、九岁和十岁都去哪儿了？现如今，我们四个第一次站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次新的征程。

我双手抓着扁扁的书包。

“你干吗这么盯着我们？”西尔维亚问，“你在看什么？”

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她颤抖的声音，纳闷那颤抖究竟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害怕？她说话时略带马提尼克岛[注]口音，而那个岛对我来说就像布朗克斯[注]一样陌生。

西尔维亚凑近我说：“说真的，你盯着我们时，到底在看些什么？我没有恶意。”

“一切，”我说，“我在看你们的一切。”



“你就是那个没妈的孩子，对吗？”西尔维亚摸了摸我的脸颊，她的嘴离我那么近，我甚至能闻到她嘴里野樱桃糖果的味道。

“不，我不是。”

那时，距离我见到那位戴黑头巾的女士还有好几年光景。还要过上几年，我才会经历那些沉默不语的下午，盯着窗台上瀑布般垂下的常春藤，还有那只深色而纤细的手，它握着钢笔，悬在空中。

天空阴沉沉的，校园铃声响起。孩子们从我们周围跑过，涌向学校大门。西尔维亚牵起我的手：“现在你就是我们的一员了。”

在之后的很多年里，确实如此。

“那时你们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多年后我问道，“那时站在你们对面的人是什么样的？”

“你看起来很迷茫，”琪琪轻声说，“迷茫而美丽。”

“而且很渴望什么，”安吉拉补充道，“你看起来很渴望归属感。”

那天，在学校色彩明亮的操场上，我们几个站在那儿，围成半个圈，都在各自的身上发现了这种迷茫、美丽和渴望。我们找到了归属感。

几个月后，我得知西尔维亚是早我一年搬到这里的，她和父母、三个姐姐一起离开了马提尼克岛。整个夏天，她都和安吉拉、琪琪一起游

荡在父母允许她活动的几条街区里，很快就忘了从前一直说着的法语。她跟她父亲一样有着一头浓密的棕红色卷发。她父亲喜欢阅读黑格尔和马塞尔[注]的书，还常常引用他们的话，用一种法语方言说给西尔维亚听，而她向我们发誓，那种方言她早就听不懂了。她笑起来的时候，那种美让我感到安宁。

琪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同样是早我一年搬来这里的，因为她母亲梦想着能在纽约市庆祝自己的二十一岁生日。“别算了。”每当别人错把她母亲当成她姐姐时，琪琪都这样说，“她就是十几岁时怀上我的。”那时正值晚秋，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琪琪一边把她粗粗的辫子别到耳后，一边翻着白眼说道。

那时我们认为早孕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知道自己绝不会这样。

有时候，安吉拉眯起眼睛，目光空洞。我们问她怎么了。“什么事都没有！”她说，“老天，你们为什么老是追着我不放，好像我是条狗！”这种时候，我们都让她一个人去生气，安静地走在她旁边，用余光打量着她的双手，直到这双手舒展开来，伸过来握住我们的手。“我一直都住在这儿。”当我们问她以前是否在别的地方住过时，她说道。“我没有什么往事可说，”她说，“只有你们。只有这里，只有此时此刻。”

---

1. 鬼妈妈（ghost mother）：指成长中母亲的缺席。——译者注
2. 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法国的海外大区，位于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官方语言为法语。——译者注
3. 布朗克斯（Bronx）：纽约的五个区中最北面的一个。——译者注
4.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4



我们是在深夜离开田纳西州的，父亲轻轻把我和弟弟从睡梦中摇醒。就在离开的几周前，父亲和母亲经常争吵。母亲发誓说她要在枕头底下放一把菜刀，晚上枕着它睡觉。“克莱德告诉我你昨晚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母亲说。其实那会儿，我舅舅克莱德已经去世快两年了。

“不要相信女人，”母亲跟我说，“即使是丑女都可能抢走本该属于你的东西。”



星期六，父亲会带我们去科尼岛(注)玩，我们三个人乘坐双L号列车然后换F号列车，一直坐到最后一站。我和弟弟从第一扇车窗向外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神奇摩天轮”，接着是停业已久的跳伞场，然后是“云霄飞车”，最后是大海。那些游荡在游乐园周围的人让我们感到害怕——瘦得皮包骨的白人男子，连脖子上都文满了文身；头发凌乱、衣不遮体的女人，走在木板路上，努力想从嗑药后的困倦中清醒过来；街头小贩不停地拉拢路人，声称自己有激动人心的“好货”；身形状硕的棕皮肤女人把小小的比基尼撑得满满的；来自波多黎各的小孩们涂着一层厚厚的婴儿润肤乳……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抓着父亲的手，央求他给我们买淋着黄油的玉米和棉花糖。但是事实上，我们身上的钱除了支付车票，往往最多只能买一份三明治和一杯苏打水作为午餐。

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有多穷。我们的公寓很小，房东只在厨房放了一张“富美家”的黄色桌子和几把椅子，在唯一的一间卧室里放了两张小床，供我和弟弟睡，在客厅里放了一张深绿色的折叠沙发。每天晚上，

在父亲亲吻我们，道过晚安后，我们都能听到他把沙发拉开，弹簧嘎吱作响。沙发就是他的床，没有枕头，只有一条薄薄的印花床单。

夏天，我们会穿着父亲的旧背心睡觉。冬天，我们会在背心外面套上破旧的长袖睡衣。弟弟的睡衣都是拣我穿剩下的，已经旧得不像样了。

但是，我们姐弟俩从来没有挨过饿，我们的脸色从来没有因饥饿而变得惨白，而且不管天气冷热，我们都能穿得适宜。我们见过真正的穷孩子，见过他们瘦削的膝盖和脚踝，他们衣衫褴褛，目光饥渴地追随街边的雪糕车，而另一边，我们姐弟俩正和父亲站在公寓的大门后，舔着甜筒。我们不是那些穷孩子。大多数日子里，我们还是过得去的。

夜里，每当我们哭闹时，父亲就会轻声地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我向弟弟保证，母亲正在前来找我们的路上。

“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弟弟问我。

“因为妈妈老是跟死去的克莱德舅舅说话，”我回答道，“但爸爸不相信有鬼魂存在。”



母亲有一双忧郁的眼睛，有着跟父亲一样修长的四肢，她的手很优雅，似乎总在伸向什么东西或什么人。但在克莱德死后，这双手变得迟缓了，很少举起来了，几乎不再伸向我们。

第一次见到安吉拉攥紧她苍白的双手时，我想起了母亲。阳光斑驳地照在车上、我们的鞋子上和亮灰色的人行道上。安吉拉跳着舞，做出芭蕾舞的姿势，一腿向后抬起，手臂前伸，舒展着纤长的手指。然后就在一瞬间，她收回了手臂，攥紧了双手，凶巴巴地皱起眉毛，我不禁后退了几步，问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但安吉拉只是耸耸肩，把手插进口袋，摇了摇头。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把手拿走，安吉拉？我想

告诉她，她这样攥紧双手不动的样子让我看到了母亲。

那一刻，一个妇人正从我们身边蹒跚走过，倦意蒙眬，不停地点头，她的一只手浮肿着，看不到血管。我们四个人静静地看着她。她棕色的皮肤看上去很柔软，皮肤下面有蓝色的光泽。

母亲那双静止不动的手现在在哪里呢？我一边看着那个妇人，一边想着，她的皮肤看起来是如此熟悉，一时间，时光仿佛倒流了。母亲那眼神哀戚的微笑现在在哪里呢？田纳西州的空气少了我们与她一起呼吸，如今是什么味道？门廊里的柠檬水；她银铃般的笑声；她将抹了发油的头发梳理整齐，那种光泽，那种芬芳。

那个妇人踉踉跄跄地走到街角，伸手去扶那个写着“停”字的路牌，但是没能扶住，之后她转过街角不见了。

少了母亲的陪伴，我们该怎么摸索着走完这趟人生之旅？即便是父亲，在科尼岛的木板路上——右边传来音乐声、吆喝声和过山车的隆隆声，左边则是辽阔的大海——他也走得缓慢而蹒跚，接下来要怎么走，他仿佛和我们一样迷茫。



一天傍晚，父亲带回了一台小收音机。他按下开关，轻柔的音乐充满了整个客厅，我和弟弟不由自主地舞动身体，在田纳西州我们就是这样跳舞的，高举手臂，好像母亲正抓着我们的手，闭着眼，垂着头，就那样摇摆着。



如果有人问我“你孤独吗？”我会说“不”。我会指着弟弟说：“他在我身边呢。”即使在每个下雨的午后，空荡荡的大街仿佛要把我整个人吞噬，我也会这么撒谎。但如果这是西尔维亚、安吉拉、琪琪和我变得亲密无间的那个秋天，我会把她们拉到自己的身边，在她们的欢笑声中

得到宽慰。



有个叫珍妮的女人搬进了我们楼下的公寓。她皮肤黝黑，身材纤瘦，戴了一顶又黑又长的假发，一直垂到后背中间。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微微扬起，说的大都是西班牙语。父亲说她来自一个叫作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地方，但当她不说话时，看上去也很有可能来自田纳西。弟弟看到她便想起了母亲，她俩都有一种诡异的美。“妈妈要回来了，”弟弟说，“就要回来了。”但父亲让我们离珍妮远一点。

父亲把我们在田纳西州时用的那把木制马鬃刷带来了，刷毛上仍然有发油和护发素的味道。给弟弟洗完头后，我把他打结的头发刷顺，他则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这是妈妈的手。”我小声说，“闭上眼睛，一切都会变成真的。”弟弟闭上了眼睛，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说：“奥古斯特，我摸到她手上的骨头了。”

每隔一个礼拜，父亲都会帮我洗净头发，然后给我三美元，把头发湿漉漉的我送到街对面多拉小姐的理发店。多拉小姐很胖，身子足以填满两张折叠椅，她总是坐在屋外，脚边放着一大玻璃罐的加冰可乐。我坐在地上，肩上披着毛巾，后脑勺枕在多拉小姐胖胖的大腿上，一边望着大街，一边龇牙咧嘴地忍受着她给我抹发油、编辫子。她一边编一边温柔地哼着小曲儿，很多时候，在《奇异恩典》或《楼上房间》的曲调中，我睡着了。

多拉小姐的儿子死于“越战”。她家的大门和台阶上，以及房子正面铝制护墙板的电线上，都装饰着许多小小的美国国旗。她的胸口上也别着一面很小的金色旗子。多拉小姐仍然饱受战争的创伤，她总是神情恍惚，眼神蒙眬地在街上踉跄走着，跟遇到的每一位复员军人打招呼。“真高兴你们安全回家了，”她说，“过不了多久，我就能看到我儿子了。”

在酷暑当头的夏日，我们看着孩子们把瘾君子团团围住，打赌他们是否会跌倒。有一次，一个小男孩在街上跑着，拿着一支不知是从哪儿捡来的注射器，针头弯曲，像举着一把枪。

在夜里，我把头埋在一块绸子里，那是从母亲的旧衬裙上扯下的。我不记得它是怎么到我手里的，只知道它现在闻起来有母亲和她发油的味道。当我和弟弟并排躺在一起时，我们听见男人从珍妮的公寓里进进出出——她的门铃发出的微弱响声，她的拖鞋在楼梯上的摩擦声，男人们跟着她上楼时的大笑声，还有她那句小声的“先给钱再碰我”。

“给钱买什么？”弟弟在黑暗中问。

“买东西。”我轻声回答，“东西而已。”



甜蜜林小镇坐落在田纳西州的一块坡地之上，坡地下方，是一片长满油松、山胡桃、山核桃和黑桦树的林子。树林后面还有土地，土地的尽头是一片湖泊。这片土地曾经归我外公所有，是祖上传下来的。我们姐弟俩出生的房子外，黏土路和广袤的青草地绵延了几千米。那栋老房子年久失修——横梁已被压弯，天花板水渍斑驳，硬木地板已经开裂。一个老旧的柴炉坐落在一只较新一些却也已坏掉的电炉旁，中间的桌台上放了一只轻便电炉。绿松石色的冰箱靠着芥末黄色的砖墙。楼上一堵墙里的管道滴着水，发出回响。布满灰尘的藏书室中，吊链窗半开着。客厅里，三本书垫在沙发腿下。每到雨天，屋子里就弥漫着一股腐木和咸水的味道。即便如此，我和弟弟还是会在这栋熟悉的房子里跑来跑去，根本不在意它的老旧。我们边跑边笑，出来进去，砰地关上门，夜里安然地入睡，天亮时开心地醒来，享受着“家”带来的那种单纯的快乐。

克莱德二十三岁。他毕业于霍华德大学[注]，有六英尺[注]高，笑起来像母亲那样温柔。傍晚，在我和弟弟入睡很久之后，父亲、母亲和克

莱德会坐在塌陷的门廊前，计划着怎样才能使甜蜜林重焕往昔的风采。但是克莱德和父亲都不知道该如何耕种那方土地。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而克莱德从小就痴迷于读书、研究地图以及和漂亮的女孩约会，所以从来就没有吃过苦，更没学过用农药消灭毛虫和锯蝇的诀窍。于是，耕种土地的任务就落到了母亲的肩上，她每天都在地里干好几个小时的农活，回家时，那双可爱的手变得粗糙而红肿。

弟弟出生那年，一场大火将南边的田地烧成灰烬。过了一年，政府来函告知，由于欠税和迟交罚款，我们的土地一大半将划归田纳西州政府所有，只有房子还属于我们。

之后，克莱德应征入伍，前往越南。那天早上，我们跟他道别，母亲忍不住哭了起来，哭得是那样伤心，我不禁捂住了耳朵，浑身发抖。六个月后，也就是1971年的冬季，母亲收到了一封信。

我们很遗憾地告知您……

这已是记忆。

寒冬和呼啸的北风敲击着窗户。冰冷的空气仿佛幽灵一样从水中升腾而起。母亲重重地跌坐在地板上，像个小女孩儿似的蜷起膝盖抵着下巴，脸埋在双腿之间。父亲斜靠着坏掉的电炉，双手捂住了脸。

现在政府是那些山核桃树的主人了。曾经属于我们家的东西被别人夺走了，被政府夺走了。

---

1. 科尼岛（Coney Island）：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南部的半岛，是美国知名的大型游乐城。——译者注
2. 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成立于1867年，是一所综合类私立大学，为全美著名的黑人大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译者注
3. 一英尺约合0.3米，六英尺约合1.8米。——编者注

5



母亲的记忆造就了我们。

琪琪六岁的时候，她母亲把她拉到镜子前。“当时镜子上已经有了裂痕。”琪琪说，“我想那可能是一个预兆吧。那面有裂痕的镜子就像我那疯狂的妈妈对我许下的诺言。”

“你的眼睛随你曾外婆，”琪琪的母亲说，“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个穆拉托人(注)，是他们带她来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琪琪从镜中观察着自己的双眼，眼角微微上挑(注)，眼珠是深棕色的。“头发也随她，”母亲抓起琪琪的辫子说，“跟她的一样又浓又密。”

“你身上唯一不好的地方，”她母亲说，“就是我遗传给你的黑皮肤。你必须找到办法摆脱它的影响，你要找到办法摆脱它。一定要待在荫凉的地方，可别让它晒得更黑，也不要喝咖啡。”

当我们四个最终成了朋友，当我们对彼此信任有加，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畅所欲言时，我们倾吐秘密，紧紧地挨在一起，或者是盘着腿，围坐成一个紧密的小圈。我们毫无戒备地倾诉着，重新翻出那些被我们吞进肚子里的、快要化为乌有的故事。

“天黑了，”琪琪说，“但是夜空中仍然有红色、蓝色和金色的光。有时候我看着自己的双臂，不禁联想到妖怪们瘦骨嶙峋的手臂。”她把双臂举到灯光下，抬起头，粗粗的辫子滑到了背上。“但有时候，”她说，“它们看起来又很美。我自己也分不清它们到底是丑还是美了。”

我们围绕着琪琪，松开她黑色的辫子，让头发一缕一缕地散落在她的肩上，然后再编好，再松开，告诉她能有这样又密又卷的头发和一双像中国女孩一样的眼睛，是多么幸运。

“等我有一天当了演员，”琪琪说，“我会在很多地方亮相——电视上啦，大银幕上啦，还有舞台上。观众们会喊：‘看谁出来了！看谁出来了！’”

琪琪的声音深邃而笃定，不带一丝怀疑，我们则跟她一样笃定——“看谁出来了！看谁出来了！”我们模仿她说着，大笑着，用手摸着她的脸庞和头发。“是那个大明星琪琪！巧克力肤色的中国娃娃！”

“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待在这儿？”琪琪突然问道。那天大雨倾盆，她的衬衣被撕了个口子，在肩膀的位置。好多个星期以后，我们才知道，琪琪家前门的锁被人撬开了。我们才知道有个士兵睡在她家地下室那漆黑的楼梯下面，在黑暗中等待着她。当时我们十二岁。

“除了你们，我谁也不能说，”琪琪说，“我妈妈会说这是我的错。”

我们把她长长的辫子盘成皇冠的形状，用发油和梳子打理她前额上婴儿般细碎的绒发。我们舔舔手指，然后抹顺她的眉毛。我们想让受伤的琪琪知道她依然很漂亮。“这不是你的错。”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说，“咱们宰了他去。”

我们坐在西尔维亚的床上，数着我们所有的零花钱，然后穿过几条街，跑到杂货店买了一小盒吉列剃须刀片，然后花了一下午帮琪琪练习如何拿着刀片反抗那个士兵。听说帕姆·格里尔在《科菲》(注)中把刀片藏在了头发里，我们想象着当那个士兵从暗处走出来时，琪琪从辫子里抽出刀片。

“我们四个会永远在一起，对吗？”琪琪问。

“当然了，”我们回答，“千真万确。我们永远是好姐妹，永远。”

然而，当那个士兵最终从琪琪家的楼梯下被抬走时，脖子上并没有插着刀片——他左手紧紧攥着一支还在滴液的注射器。当公寓管理员发现时，他已经死了三天了。



安吉拉的皮肤很是透亮，几乎可以看到她青色的毛细血管。她在电视上见过约瑟芬·贝克(注)、莉娜·霍恩(注)和特怀拉·撒普(注)。只要优美的歌声一响起，她就会跳舞，动作是那样行云流水。当我们看着她，为她美丽的舞姿倾倒时，她的身体中又散发出一种深切的悲伤。我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又意味着什么。她的身体是那样柔韧有力。每个星期六下午，安吉拉都会背着乔·威尔森舞蹈学院的书包出现在街上，黑色紧身舞衣散发着一股汗味。“我妈妈以前是个舞者。”她告诉我们，然后很快陷入沉默。

“她现在还跳舞吗？”我们问。但安吉拉背过身，耸耸肩说：“你们干吗对我的每一件事都刨根问底？”她说：“有时候跳。”接着又说：“可恶，你们说说，干吗要把每一件事都弄得这么复杂？”她把脸埋进琪琪的头发里，颤抖着，最终哭了出来。“我们爱你，安吉拉。”“你真的很美。”“你要一直跳下去，别管那么多。”我们安慰她说。

有个会跳舞的妈妈是否是件伤心事？我们没问安吉拉，只是试着去理解。我们等待她攥紧手指，握成拳头。我们躺在西尔维亚粉红色的卧室里，把耳朵贴到安吉拉瘦弱的胸口上，听着她急促的心跳。“安吉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央求她，“告诉我们吧，求你了，求求你说出来吧。我们有刀片，谁惹了你，咱们就去报复他。”

我们把刀片藏在长筒袜里，留长了指甲。我们学着以当地人的姿态走在布鲁克林的大街上——高声说话，放肆大笑，仿佛我们一直都属于这里。

然而布鲁克林却有着更长的利甲和更无情的锋刃。任何一个吸毒成瘾的士兵或膝盖上沾满粉笔灰的饥儿都清楚这一点。要是他们当时告诉我们就好了。



我真想钻进西尔维亚的皮肤里。她漂亮的古铜色皮肤下，仿佛有什么东西镶嵌着钻石，灿烂闪耀。每当我们走在一起时，安吉拉、琪琪和我都争着要走在她身边，挨着她的胳膊。当她想牵我们的手时，我们都会争相去握。她有着黑亮的眼睛和大大的嘴巴，牙齿整齐，嘴唇丰满，有着一种难得的美，让我们心生嫉妒。当我们还远远没有步入青春期时，她的声音就已低沉沙哑，小小年纪就有了一副成熟女人的嗓音。不过，我真正渴望的并不是她的皮肤、眼睛或者嗓音；我只是想变成西尔维亚，像她那样行走在这个世界上，透过她的双眼观察世界。“那个女孩是在嘲笑我们吗？”弟弟刚见到她时就这么问。现在我知道了，西尔维亚当时确实是在嘲笑我们，因为她嘲笑所有人。当父亲对她说：“我们要去美国了。”她也是这样笑的。他那蹩脚的英语在她听来很可笑，像一个木偶张嘴说着新学的单词。“我们要永远留在那儿。”

“美国有什么啊？”她问父亲，“你老是一遍又一遍地提美国。”

在她四岁时，西尔维亚就开始读她八岁姐姐的书。五岁时，老师要求她放学后跟一群十岁的孩子一起练习复杂的除法，学习拉丁词根。在家里，当她父亲扮演对方律师，引用法国哲学家的话进行辩论时，西尔维亚站在她的一堆玩具娃娃前，问那群不会眨眼的“陪审团”，它们是否可以看到她当事人的内心，看到那里的清白。

“我爸爸说要先学法律，”西尔维亚告诉我们，“然后才能学其他我喜欢的东西。”

我们问她“你喜欢什么”，西尔维亚环顾她完美无瑕的粉色房间，说：“我又不能替自己拿主意，我怎么可能知道。”



也许每个孩子一开始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大人们总是希望我们能够实现他们没能实现的梦想。我父亲说，我很聪明，长大可以做个老师，尽管我渴望钻进西尔维娅的皮肤，拥有她的人生，包括将来成为一名律师。安吉拉的妈妈把舞蹈梦转移到她的身上。而琪琪呢，她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钻进任何人的皮肤，成为她想成为的人。只要闭上眼，原来的她就可以消失不见；只要闭上眼，她便可以去任何地方。

---

1. 穆拉托人（Mulatto）：指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儿，此词现在一般认为具有冒犯性。——编者注
2. 眼角上挑的眼睛（Slant-eyes）被认为是亚洲人的标志。——编者注
3. 《科菲》是一部1973年的美国动作电影，由帕姆·格里尔主演，讲述了黑人女护士科菲复仇，与毒贩搏斗的故事。——编者注
4. 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1906—1975）：美国黑人舞蹈家、歌唱家，以其性感大胆的舞蹈和柔美的歌声红遍法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黑人超级女明星”。——译者注
5. 莉娜·霍恩（Lena Horne，1917—2010）：美国歌手、女演员和舞蹈家，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她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并支持废除种族隔离政策。——译者注
6. 特怀拉·撒普（Twyla Tharp，1941— ）：美国舞蹈家、编舞大师。——译者注

6



1968年，比夫拉的儿童食不果腹，弟弟尚未出生，而我还太小，不懂身为儿童，生在比夫拉，或者食不果腹意味着什么。比夫拉是一个只存在于母亲警告中的国家——“把豌豆吃了，比夫拉的孩子在挨饿呢”，以及电视屏幕上那些眼神空洞、肚子鼓起的棕皮肤孩子。但在比拉夫回归尼日利亚很久后，在它重新并入那个一直致力于从中脱离的国家后，很长一段时间，那些孩子的面孔和鼓起的肚子依然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在布鲁克林家中的餐桌上，在父亲所放的一堆旧杂志中间，我找到了一期《生活》。封面上是两个看不出性别的孩子，“比夫拉战争中的饥儿”几个大字盖过了那个高个孩子身上的破烂白衣。

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个梦魇呢？

我盯着杂志封面。那两个孩子也盯着我，眼神中充满了不信任。跟他们棕色的小脑袋比起来，那两双眼睛是那么大，但跟他们突起的骨头和鼓起的肚子一比，又显得那么小。母亲没有骗我，确实有小孩在挨饿，这就是证据，这本杂志的封面就是证据。一连几个小时，我抚摸着他们几乎光秃秃的脑袋，手指滑过他们天使一般的脸蛋。我想，如果世上真有天使，他们降临人世后就变成了比夫拉的孩子，让人忘不掉又触不到。

不，我们还没有穷到这个地步。我们的肚子塞满了食物，撑得鼓鼓的。我们的腿虽然很细，但是有肌肉。我们的头发上抹了油，干干净净的。

但仅此而已。



一天，一个穿着天蓝色套裙的女人出现在我们的公寓楼前。她带了两个小孩，那两个孩子有着和珍妮一样的深棕色皮肤，年纪比我八岁的弟弟小。“我的宝贝们。”我们听到珍妮一边喊一边跑下楼梯。“哦，感谢老天，我的孩子们回家了[注]。”那个女人离开后，珍妮敲开我家的门，低声说：“拜托照看一下他们，我去弄点吃的。”

两个孩子一直没作声，睁着大大的黑眼睛盯着我和弟弟看。女孩约莫四岁，男孩还不到两岁。女孩穿着一条带褶的粉色连衣裙，又短又小，赤脚穿着一双白色的漆皮鞋。男孩穿着T恤和毛边短裤，裤子里面是鼓囊囊的尿布，脚上是一双露趾的白色高帮漆皮童鞋。我把他们领进家里，重新锁上门。过了一会儿，他们两个都哭了起来。弟弟喂给他们一些薯片，两个孩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们又给了他们一些苹果、坚果、几片腊肠和果冻。他们来者不拒。

几个小时后，珍妮总算回来了，她眼神蒙眬，挠着胳膊和腿，假发戴得歪歪扭扭。我们看着她走进楼里，等着她上楼来接孩子。可是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人来。我们最终还是把两个孩子带下了楼，领到她门口，看着她心不在焉地把他们领进屋，关上了门。过了一会儿，隐约听到楼下传来了孩子们的哭声。

我走到收音机旁，调换着频道，直到音乐响起，盖过了所有的声响。

---

1. 原文为西班牙语。——译者注

7



那一年，每一首歌仿佛都在从某个维度讲述我们的故事。在西尔维亚的房间里，我们几个围在小小的收音机旁听音乐。每当琪琪的母亲不在家时，我们放学后就去她家，等在一边，看琪琪用挂在脖子上的钥匙开门。她家的简易厨房里没有长沙发，于是我们便围绕着电唱机坐在地板上——把音量调得低低的。我们侧耳倾听：艾尔·格林[注]祈求我们把头躺在他的枕头上；塔瓦雷斯合唱团[注]请求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曾让我们忘记的事情；蜜妮·莱普顿[注]和西尔维亚的高音飙得那么高那么长，好像世界正在走向尽头。

世界确实正在走向尽头。那时我们都还是小女孩，轮流穿着琪琪妈妈的白色长靴在屋里摇摇晃晃地练习着走路。

布鲁克林的碎片剥落，显露出那时的我们。

我们嫉妒彼此的头发、眼睛、屁股、鼻子。我们互换衣服、分享三明治。有时候，我们笑得那么肆无忌惮，直到汽水从鼻子里喷出来，止不住地打嗝。

当男孩用难听的话骂我们时，我们回答："我的名字你连提都不许提，不许把它挂在嘴上[注]。"当他们说"反正你长得丑"时，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当他们大喊"自大狂"时，我们说："不，这是自信！"我们看着他们泄气地走开，因为年纪太小，他们找不出话来回击。他们压根不懂我们四个人的世界，只了解那些形单影只的小女孩——双手抱在胸前，祈祷着不被发现。



八岁，九岁，十岁，十一岁，十二岁，我们清楚那些注视着我们的目光。

因此，我们互相提醒着对方，留心盖茨大道修鞋摊上那个长得像杰佩托[注]的老头。修鞋时，他会让女孩坐在小隔间的硬木凳上等待着，以便偷瞄她们裸露的腿和脚丫。“找个人陪你一起去，”我们提醒对方，“记得别穿裙子。他会给你二十五美分，要求看你的内裤。”

不穿琪琪母亲的鞋子练走路时，我们穿玛丽珍鞋[注]和帆布运动鞋。每当鞋跟磨坏或鞋底脱胶时，大人就会塞给我们一美元，让我们去盖茨大道。“就看一下，”那个老头说，“好不好？”手里捏着的那枚二十五美分硬币闪闪发光。我们摇头说不行，我们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但难堪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

“有时候，教堂的牧师会趁我在唱诗班歌唱时走到我身后，”琪琪说，“我能感觉到他那玩意儿贴在我后背上。千万别参加教堂唱诗班。”她喃喃说着自己在别处是何等风光。“闭上眼睛，砰的一下子，我就不见啦。这是妈妈教我的。”琪琪告诉我们，“常常你看着她的眼睛，而她早已不在那儿了！”

“但当妈妈想起我的时候，”琪琪说，“她总让我去好莱坞。她说在那里我会很安全。”

我们没想过去问她：“安全？你有什么危险？谁给你带来了危险？”我们以为自己知道。

我们向琪琪保证，以后她肯定会比我们几个更加出人头地。我们告诉她，没有哪个棕皮肤的女孩有她这样异域风情的眼睛、这样长的头发。我们深信不疑地说：“你就是好莱坞需要的，我们都等不及在电视上看见你了，你会比黛汉恩·卡罗尔[注]更出名。”

“不要相信祭坛男侍童，”西尔维亚提醒琪琪，“如果你是唯一的祭坛女侍童[注]。”

当西尔维亚开口唱尼娜·西蒙[注]的《就如大拇指汤姆般忧郁》[注]时，我们的喉咙会跟着微微颤动，牙齿紧咬。西尔维亚有着敏锐的乐感，她深深地沉浸在音符之中，而在我们听来，那些音符却半隐在旋律之后，很难分辨。“那里有许多渴望爱情的女人，老天，她们会把你搞得一团糟……”

“你就是块当歌手的料，”我们说，“不当不行！”

“学完法律后再说吧。”西尔维亚说。

我们努力维系着这份友谊。我们一起跳长绳，一次摇动两条绳子，玩抓子游戏；我们沿街追赶雪糕车，挥舞着攥满零钱的拳头；我们像青蛙一样在树墩上跳来跳去，相互推搡着钻进消防栓龙头喷出的水花中；伴随着“斯莱和斯通一家”乐队[注]的《公交车》[注]跳舞，又迫不及待地要听范·麦科伊[注]的歌跳哈娑舞；我们买印有自己名字和星座图案的T恤衫。

然而，当我们都站在十二岁的尾巴上时，我们的乳房和臀部开始发育，双腿日渐修长。我们有着好看的唇线，我们摆头的样子对陌生人而言似乎有了莫名的吸引力。眼看着我们就要十三岁了，走在街区里，仿佛这里的一切归我们所有。“看什么看，”我们举起手，挡住脸，对那些男生说，“把眼睛移开！”

我们确信能松开彼此的手，独自走在街上，即使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在那漆黑的小巷里、街角处、拉着帘子的窗户后面，总有男人躲在那儿，伺机抓住我们，对我们动手动脚，甚至解开裤子拉链向我们展示裤裆里的家伙。

那盒剃须刀片早就丢了，我们总是忍不住咬指甲，没人真的把指甲留长，然而危险从未离我们远去……

一个我两个我三个我四个我，我们唱着，一个我们两个我们三个我们四个我们。

我们拍手唱：下来，下来，宝贝，坐着过山车下来。最亲最亲的宝贝，我不会让你走[注]。因为我们想要相信，自己早就长大了，早就不是“最亲最亲的宝贝”了；想要相信我们会永远这般亲密无间，西尔维亚、琪琪、安吉拉并没有待在我最远的指甲尖以外，我们亲如手足。我有好多年没听到母亲的告诫了。当她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会把我的朋友们介绍给她。我会说：“你错了，妈妈。看我们抱得多紧，看我们笑得多欢，看我们永远永远也不分开。”

我会说：“你能看到这一切吗，妈妈？你能看到吗？”

我们的街区里有个男人，他曾经也是个小男孩。他常穿着军装走在大街上，两只袖子空荡荡的，没了双臂。他学会了怎样用牙齿咬住注射器，用舌头推动活塞，将毒品注入腋窝附近的静脉。

夜里，我和弟弟会透过窗户看到他，他的头垂得低低的，就像鸟儿把头埋进翅膀里。

“千万不要碰毒品。”弟弟跟我说。

“你也不要。”

“我不会碰的。”弟弟说。

我和弟弟睡醒后闻到一股房子烧焦的味道，那房子离得远，我们看不到。弟弟说他也许会当个消防员，或者是宇航员，也可能是科学家、警察、摇滚乐队的鼓手或者农民。

农民。因为当初在甜蜜林小镇上，我们有一座农场。

我看着弟弟窥探这个世界，他神情严肃，充满焦虑和好奇。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能看到人们满怀梦想，试图摆脱身处的境况。仿佛除了这里，还有另一个更好的地方，仿佛还有另一个布鲁克林。

“奥古斯特，”弟弟一遍又一遍地说，“看那儿，还有那儿，那儿。”

我们依然同住一间卧室，两张床只有一英尺之隔。我们每天醒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对方是否在身边。“嘿。”“嘿个头，干草是喂马的[注]。”“爱你。”“我也爱你。”每晚安睡之前，我们都会这样轻声对彼此说。我们在黑暗中伸出手，越过两张床之间的空隙，十指相扣，直到手心渐渐冒出了汗，也仍然没有放手。

“爸爸，那个瓮里装的是什么？”

“你知道装了什么。”

“你说那是骨灰，但那是谁的骨灰啊？”

“你知道是谁的。”

“是克莱德的吗？”

“我们把克莱德土葬了。”

“那是我的吗？”

一切已成记忆。

---

1. 艾尔·格林（Al Green，1946— ）：美国灵魂乐大师，20世纪70年代灵魂乐风潮中的风云人物。——译者注

2. 塔瓦雷斯合唱团（Tavares）：由美国五名黑人歌手组成的合唱团，作品类型主要包括说唱乐、骤停打击乐和灵魂乐。——译者注
3. 蜜妮·莱普顿（Minnie Riperton，1947—1979）：美国黑人女歌手。海豚音女王，堪称有史以来天赋最佳的女歌手之一。——译者注
4. 在英文中，“Call one's name”（叫某人的名字）有“咒骂某人”之意，所以主人公回击“我的名字连提都不许提”（Don't even say my name）。——编者注
5. 杰佩托（Geppetto）是经典童话故事《木偶奇遇记》中亲手雕刻出匹诺曹的老木匠。——译者注
6. 玛丽珍鞋：指圆头、低跟、鞋背上有绑带或搭扣的鞋子。——译者注
7. 黛汉恩·卡罗尔（Diahann Carroll）：193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美国黑人女演员、歌唱家。1975年，获得第4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译者注
8. 祭坛男侍童或女侍童：指天主教举行弥撒时，协助神父的侍童。——编者注
9. 尼娜·西蒙（Nina Simone，1933—2003）：美国歌手、作曲家、钢琴表演家。——编者注
10. 《就如大拇指汤姆般忧郁》（*Just Like Tom Thumb's Blues*）：“Blues”一词既有“蓝调音乐”的意思，也有“忧郁”的意思。——译者注
11. 斯莱和斯通一家（Sly & The Family Stone）：美国一支七人摇滚乐队。——编者注
12. “Loose Booty”指作风轻浮的女人，类似于中文里“公交车”的比喻。——译者注
13. 范·麦科伊：美国黑人歌手、音乐家。他最有名的一首歌是《哈娑舞》（*The Hustle*）。而“hustle”一词也有“迫不及待”“争先恐后”的意思。——编者注
14. 这是一首英语儿歌《下来，下来，宝贝》。游戏时，两个或多个孩子围在一起，边拍手边唱这首歌。——编者注
15. 在英语中，Hey（嘿）与Hay（干草）发音相同。有一些人认为打招呼时说“嘿”不礼貌，并以此开玩笑。——译者注

8



一年夏天，纽约市停电了，人们洗劫了百老汇大道上的商店，然后开着敞篷车穿过我们的街区，抱着鞋盒、电视机，还有被典当出去的皮大衣。我和弟弟从窗户里看着这一切。父亲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们说，街上太危险了，但凡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出门。我们点燃蜡烛，在炉灶上加热了几只即食通心粉罐头。冰箱里的食物正在变质，父亲寻遍街区里的商店去买冰袋。如果说比夫拉和越南比我和弟弟所能想象的还要可怕，那次大停电才真让我们体会到了世界末日。我们听到喇叭声、警报声响彻夜空，看到小贩们高举着他们偷来的一盒盒东西，大声叫卖。早晨，父亲只准我们走到公寓大门口，在那儿，我们看到一个老妇人抱着一堆偷来的干洗衣物穿过街区，包衣服的塑料袋闪闪发光，老妇人笑得合不拢没牙的嘴。我们看到两个男孩正在轮流试穿一双新溜冰鞋，其中一个胳膊下还夹着包装盒。我们看到十几岁的孩子们跑向百老汇大道，于是不停地央求父亲放我们同去。“他们这是在偷东西。”父亲说，“我们可不能偷。”

好多年前我们就听说百老汇大道上的商店老板们个个都是白人，他们住在布伦特伍德、雷哥公园区、劳雷尔顿(注)等地的豪华别墅里。我们知道所谓“筹资”，就是看着邻居们还远远没有还清房贷，就把破旧的沙发、垫子扔进小巷里。因此，当我们看着那些偷东西的人穿梭于街区之中，叫卖他们从被砸烂窗户的商店里抢来的电视机、录音机、鞋子和干洗的衣物时，我和弟弟也很想加入百老汇大道上那场白吃白拿的狂欢。但是，父亲依然不准我们迈出大门一步。他是认真的。

那个夏天，每座公园、每所学校都在提供免费午餐——用一次性塑

料膜包裹的腊肠三明治放在棕色纸袋中，还配着用铝箔封口的杯装加糖橙汁。我们看着饥饿的孩子们在大热天里排队，等着领食物，一边盼着有哪个正在帮忙派发午餐的邻居，可以偷偷多塞给他们一份。在那个没有冰箱的炎炎夏日里，父亲丢了在亚伯拉罕与施特劳斯百货商店的工作，几乎身无分文，我和弟弟不得不加入领取免费午餐的公园队伍里。长长的队伍围绕着整个公园，沿着一排用铁链拴起来的围栏，缓缓向前挪动。我搜寻着西尔维亚、安吉拉和琪琪的踪迹——我害怕看到她们像我们一样又饿又热，用沾着灰尘的手羞愧地接过棕色食品袋。

关于最后几户白人邻居的记忆也开始逐渐淡去。有个德国女人，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一头雪白的头发又短又密。周日，已经成年的儿子们常常带着各自的孩子回来看她，但那三个男孩不跟我们一起玩。夏天，这几个穿带领衬衫、剃着金色板寸的男孩坐在他们奶奶家门口的台阶上，看着棕皮肤的男孩们在大街上用黑乎乎的绳子抽打木陀螺。他们的父亲剃着同样的板寸头，穿着同样的浅色带领衬衫。临近傍晚，几位父亲走到台阶旁，男孩们站起身来，跟在父亲后面走向路边那几辆一模一样并排停靠着的旅行车。车子开走时，男孩们还在盯着我们，有时，最小的那个会冲我们摆摆手。

接着，那群站在路边给车让道的黑人男孩又跑回路中央，继续玩游戏。可那三个衣着得体的男孩一走，这群穿着脏兮兮的毛边短裤和白T恤，膝盖沾满灰尘，疯狂抽打破旧木陀螺的棕色皮肤男孩，看上去也明显不一样了。

我们也不认识那一家子意大利人，或是那对爱尔兰姐妹。她俩每天早上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出门，推着一模一样的购物车，晚上拎着大西洋–太平洋食品公司[注]的袋子回来。我们不认识那个总是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冲街上的男孩大喊大叫的男人，也不认识那有着红色卷发的一家人，那位妈妈看起来总像是刚刚大哭过一场。

但我们熟悉他们的搬家车，他们的轿车，以及那些帮忙搬家的人——这些人一次次地帮他们检查车子，然后狠狠瞪着街上的男孩。我们知道，陀螺底下的尖并不是用来伤人的，只是用来撞击其他陀螺的，也知道男孩们唱的“唔嘎哇[注]，黑人权力！消灭！白人男孩！”仅仅是句歌词而已，并不是真的要把白人赶出我们的街区。

然而，他们还是逃走了。

他们驾车离开，或是坐在儿子或女儿的汽车后座上离去。他们在房前挂上“此屋出售”的标志，但还没找到买家就走了。他们把房子租给单亲妈妈、瘾君子、波多黎各人、黑人，只要是拿得出一个月房租做押金的、有份工作的人，他们都租。他们把床垫、断腿的桌子和一箱箱旧书扔到街上。

他们开着轿车、货车和卡车远离了那群棕皮肤的男孩，在街角打着转向灯，逃离了我们的街区，一去不返。



弟弟接触了数字，体会到数字的奥妙以及那些无限而确定的可能性。大多数日子里，他都坐在床边计算着普通八岁孩子理解不了的数学题。“平方是绝对的。”他说，“这世界上没有人会对代数或几何提出异议，没有人会说π是错的。”

“跟我来。”我恳求他。

但弟弟从数字堆里抬起头说：“她已经走了，奥古斯特。这是绝对的[注]。”



深秋时，那个女人回来接走珍妮的孩子。她怀里抱着小的，大的那个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没有回头。小男孩在大声哭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问。

“他们把珍妮的孩子带走了。”

我帮那个大的抹过发油，编过辫子——三根“玉米辫”从前额编到脑后，绑着蓝色的“歌妮”丝绸发带；我喂过他们麦片、熏牛肉三明治、玉米面粥和鸡蛋；我给他们的胳膊和腿涂上凡士林，用湿毛巾擦去他们嘴边的牛奶沫和眼角的眼屎。我给他们读过故事、唱过歌，把纸巾弄湿，帮他们擦去鼻头上的脏东西。那个女孩笑起来时，会露出洁白无瑕的牙齿。

现在她头上的发带已经不见了，她蹦蹦跳跳地转过街角，没了踪影。在他们消失很久以后，弟弟还信誓旦旦地说，他能听到那个小男孩的哭声。



我幻想父亲带回家的那些女人，在母亲来到我们身边之前，能暂时充当母亲的角色。每一句“嘘，我的孩子们在睡觉”或是“主啊，你家孩子好可爱！”，都会拉近她与我们的距离。我躺在床上，听着玻璃杯里冰块发出叮叮当当的撞击声，听着笑声逐渐变轻，直到被喘息和呻吟声取代。我幻想醒来的时候，面前会出现一个女人，头上戴着卷发夹，一手掩住睡袍，一边问我想吃薄饼还是麦片，一边在橱柜里翻找最后一罐糖浆——要是没有的话，就撒一点肉桂和糖。我幻想她用一双结实有力的手把我的头发编成紧紧的“玉米辫”，幻想她让弟弟把拇指从嘴巴里拿出来，幻想着她在父亲出门上班前吻别他。

我幻想我们四个人坐在厨房餐桌旁，不再有难吃的食物，取而代之的是热乎乎的酱汁和白米饭，她会不厌其烦地问我想吃多少。直到母亲到来前，她会一直住在这里。

多年后，我把这一切的幻想都告诉了索尼娅女士，想让她知道，我

曾梦想这个家能再次完整，我相信这个家正在变得完整。



庞乔杂货铺的柜台上有个坛子，里面装着腌肉，老板会把它舀出来装进棕色纸袋里出售。要是你说“我想自己挑”，老板庞乔就会回答：“别挑！我来挑！”用他苍老的眼睛把你从头看到脚。如果你真的很饿，就不得不由他。

我幻想我们四个人——弟弟、爸爸、新妈妈和我啃着骨头上的最后一点肉，然后把软骨和骨头包起来放回纸袋，再喝上一瓶“胡椒博士”(注)。

打包出售的外卖每份十五美分。在塑料袋里洒上点热酱汁，几乎就是一顿大餐。弟弟把他那份不带酱汁地吃下去，有时候会多加点盐。

日子好的时候，父亲会带我们到街角，给我们买三明治。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来到家里的那个女人没有在夜里轻手轻脚地走过我们的房间，没有在父亲给她倒威士忌时说“一口就好”，也没有跟我们坐在一起吃那些东西。她是伊斯兰民族组织的一员：她裹着头巾，黑色的长裙一直垂到脚踝。她说她叫洛蕾塔。她的身体像一座神庙，遮得一丝不露，与父亲保持着距离，瘦削的脸上没有那些蒙昧的女人所涂的脂粉。她说：“我知道自己本身有多迷人，多完美。”当她低头朝我们微笑时，那深色的脸庞上流露出坦率、渴望与美丽。

她说：“你们的父亲准备改变他的生活和信仰。”

她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来到了我们的公寓，把橱柜里落满灰尘的锅碗瓢盆统统拿出来泡在温热的肥皂水里洗涤。她一边干活一边轻声哼着小曲。父亲则坐在桌旁读着《古兰经》，一道布鲁克林的阳光像水一样

流淌在书页上。那个女人的手很大，干起活来很利落，好像一直都熟悉我家的小厨房，熟悉那发黄的水槽和油毡剥落的桌台。我望着这一切，想象那是母亲的手，想象我们又回到了甜蜜林，回到了坏掉的炉子和积灰的书架边。我坐在厨房门口，下巴抵着膝盖，抬眼望着她。她胸脯十分丰满，但算不得胖。她身姿曼妙，有着温柔而深邃的眼神，而我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一切。有一天，我也会拥有丰满的胸脯、臀部，像她那样大的手。有一天，我的身体也会向世界诉说藏在衣服下面的故事。



洛蕾塔为我们做了菜豆和干酪焗茄子。她说我们不能再吃羽衣甘蓝和利马豆了，我和弟弟回答："哦了[注]。"我们学会了用黑人俚语说话。她把我们拉到身边，看着我们的眼睛，说黑人俚语会让我们变得没有教养，一辈子走不出贫民区。我们相信了她的话，只有在她听不到的时候才偷偷讲几句俚语。每当她按门铃时，我总是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下楼梯，第一个跑到她面前。她匆匆地抱了我一下就放开了手，说有太多活要干。她煮了父亲买回家的几袋生花生，洗去上面的盐，我们的薯片也不见了。她是安拉的信使——令人尊崇的伊利贾·穆罕默德派来的。她说安拉是上帝，而当我们说"上帝是白人，因为他的儿子是耶稣"时，她摇摇头，扫了一眼公寓里厚厚的尘土，然后再次摇了摇头。她说："如果这是安拉派给我的使命，我想我可以处理好这一切。"

她白天过来，拿着拖把和水桶，教我们如何戴上黄色的橡胶手套。我们一边打扫着角落里积聚的污垢，一边跟她讲甜蜜林的事情，告诉她母亲穿过树林走向湖泊时，是多么的漂亮。"我过去常常跟她一起走。"我说。耳边仿佛再次响起了踩碎的松针发出的嘎吱声。

"你会喜欢甜蜜林的，"我说，"那里比这里安静多了。"

"安拉会保佑每一个地方。"洛蕾塔说，"有安拉在，快乐就会重回人间。"

我们一起跪在一桶高乐氏清洁剂旁，用硬刷来回擦着油地毡，直到厨房地板四角的棕色消失，露出本来的浅绿色。傍晚时分，我们铺开跪毯，面朝麦加的方向跪拜。

洛蕾塔没有食言，安拉治愈了我们。弟弟那串从前臂延伸到手腕的毛毛虫似的结痂也正在慢慢消失，变成一道红棕色的伤疤。他对自己的伤疤得意扬扬，把手臂举得高高的，就像休伊·牛顿[注]那样握着拳头。

伊斯兰民族组织的信众跟我父亲说，弟弟的情况本来可能更糟，是因为安拉庇佑他才能平安无事。碎玻璃可能会砸伤楼下的人，割破他们的血管；弟弟可能会失去那只手臂；又或许，那天晚上，父亲可能会在街区里慢慢散步，或是下班后去喝上一杯。

我们生活在一系列的回忆中：弟弟那如噩梦般被缝合的手臂；枕头底下藏着一把刀的母亲；我们身体里那个看不见的白色魔鬼，正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终于，洛蕾塔像一个没有翅膀的"修女飞飞"[注]一样，俯冲而来，拯救我们。



关于比夫拉儿童的记忆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电视新闻中芝加哥、洛杉矶、纽约等地贫民窟里的饥儿画面。我们盯着电视，看着镜头摇过那些贫民区，最后聚焦到儿童身上，他们用饥饿的、疑惑的眼神盯着我们。在纽约，镜头对准了街头的波多黎各帮派，他们大笑着，扭打着，前景中，一位神情严肃的记者提醒我们注意人身安全，弟弟则趴在窗口寻找着摄像机。



我和弟弟擦着橱柜的木门和玻璃把手，与此同时，洛蕾塔正在为我们做豆沙派、加芝士酱的烤萝卜、橙浆甜菜、咖喱饭、烤牛排和芦笋。傍晚时分，她带回从清真肉店买来的鸡肉。当我们叫她洛蕾塔妈妈时，似乎真的忘记了母亲还会回来这件事；我们央求洛蕾塔摘掉黑头巾，让

我们看看她的头发。她四下环视，确定父亲不在场后，终于摘下了头巾，露出了里面自然生长着的短发。她把我的头发编成“玉米辫”盘在头上，向我保证，只要我吃正确的食物，听从信使伊利贾·穆罕默德的指示，把所有的赞美都献给安拉，并且永远保持谦卑，长大后就会像洛拉·法拉纳(注)一样漂亮。于是我并紧双腿，用宽松的衬衣遮住开始发育的乳房，向她保证我会永远保持安拉所赋予我的圣洁。然而，我是在说谎。

清晨，我双膝跪地，面朝麦加的方向，静静地为母亲祈祷——祈祷她会在黑夜中回到我们身边，吻醒睡梦中的我们。我祈祷脑海里纷繁混乱的记忆能理出头绪，好让我理解当我与新交的男朋友杰罗姆接吻时，他的手在我身上摸索游走的感觉。我知道自己正迷失在这个世界里，一边望着它，一边想弄明白为什么我常常感到自己置身事外——置身一切事物之外。



洛蕾塔与我一起祷告，我们两人在一个房间里，与父亲和弟弟隔开。尊敬的伊利贾是神明选中的信使，我们是安拉选中的子民，安分守己，祷告时戴上头巾，不吃那些会吞噬我们灵魂的食物，我们的心智正在变得更加深刻。

夜幕降临时，洛蕾塔离开了。

然而……

在乌干达，巴干达人(注)会在对方还是个幼童时就为他准备好棺木，人人如此。

---

1. 布伦特伍德：纽约市一个比较富裕的区域。雷哥公园区：位于纽约市皇后区，多犹太裔居民。劳雷尔顿：纽约市皇后区的犹太社区。——译者注

2. 大西洋–太平洋食品公司（A&P），美国连锁零售超市。——译者注

3. “唔嘎哇”（Ungawa）一词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黑人青少年群体，它模仿白人对其他人种打招呼时的用语，表达“黑人权力”并嘲讽白人的种族歧视。——编者注
4. “It's absolute”（这是绝对的）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千真万确的”。——译者注
5. 胡椒博士：一种碳酸饮料。——编者注
6. 原文为“I can dig that”，是一句黑人俚语，意为“我知道了”。——译者注
7. 休伊·牛顿（Huey Percy Newton，1942—1989）：非裔美国政治活动家和革命家，创立了黑人左翼激进组织黑豹党，信奉黑人至上主义。——译者注
8. 《修女飞飞》（*The Flying Nun*）：美国情景喜剧，讲述了一名会飞的修女与修道院和邻居之间的搞笑故事。这位修女体态轻盈，戴着鸟翼形状的白布帽，一有风就能飞起来。——译者注
9. 洛拉·法拉纳（Lola Falana，1942— ）：美国黑人女歌手、舞蹈家、演员。——编者注
10. 巴干达人：又称“干达人”，乌干达的主体民族。——译者注

9



我拒绝在公共场所戴头巾，拒绝作为安拉的信徒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穆斯林信仰仅仅是我内心的一部分而已，我还要留出空间容纳其他美好的事物。“让她成为她想成为的人吧。”父亲说。“对，”我说，“让我做我自己。”

当我和弟弟发起高烧，胃疼得厉害，或者头痛难耐，需要一双温柔的手安抚我们的时候，她就变成了我们的洛蕾塔妈妈。当我们围在一起，玩“大富翁”和棋盘游戏时，不禁会被她的笑话逗得开怀大笑，哀求她：“再讲一个吧，洛蕾塔妈妈。”但她不是我们的妈妈，我们都明白。

早餐时，每当电台播放多萝西·穆尔[注]演唱的《蓝色薄雾》，父亲就会面对盘中的食物陷入沉默。他不时瞟几眼窗户，仿佛母亲会突然出现，像鸟儿一样飞落在窗台上。*哦，已经过了这么这么久，看来我已经把你遗忘*[注]。

然而母亲没有出现。我想象着她现在头发散乱、瞪大眼睛、疯子似的模样，她不再是从前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女人了——在她弟弟的幽灵出现以前，那个会把衬衣熨得整整齐齐、双唇张开对着镜子涂口红的正常女人。



夜里，父亲和弟弟一起去清真寺做礼拜，和女人隔开。家里很安静，我一个人裹上头巾，跪地祈祷。我把额头贴到地板上，双手向前伸展。有一天，我们会长大，变成女人，西尔维亚、安吉拉、琪琪和我。

到时候，我们就不会一起挽着手同行了，下午我们不会枕在彼此的大腿上，互相打理头发。我也不会再把耳朵贴近她们的胸口倾听心脏跳动的声音，不会再一边唱着歌谣一边跳着长绳。当我们变成女人时，一切都将不复存在。我们不可能再做朋友了，如母亲所说。我们不会再信任彼此。目之所及处玻璃破碎，露出无情的真相。



我九岁那年，杰罗姆抬头望着我家窗口，冲我眨眨眼睛，那时他正和小伙伴们在街上玩。我不知道该如何眨眼回应，不知道要如何在那张棕色的脸上找寻希望和允诺，甜蜜林的世界和布鲁克林的世界还尚未融为一体。所以几年之后，当他抓住我的手说“我了解你”时，我抬头看着面前的这个少年，想起了如此之多的事情。“有一天，我俩会做那件事。”他说。那时我十二岁，以为十六岁的男孩会对每一个女孩说这样的话，于是点点头说：“好吧。”他靠过来，亲吻了我。

谁能理解被一个少年亲吻时那种战战兢兢又美妙无比的感受呢？我想，只有闺密们能懂。

只有她们。



西尔维亚是她家四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她们上钢琴课，上舞蹈课。每个周日下午，当一家人从教堂回来后，一个法国女人会在客厅里等待着女孩们。“你们必须这样走路。”她用法语说，“坐下时，必须像这样交叉双腿。这是沙拉叉、甜品匙、红酒杯。”安吉拉、琪琪和我在她家门厅朝屋里张望，她妈妈凌厉的眼神让我们不敢迈进大门。除此之外，那个女老师的眉毛似乎也在说：“你们不属于这里。”即便离得老远也能感受到。我们听不懂法语，但能听懂她话里的腔调。挤在门厅的我们不再迷茫和美丽，她母亲的一丝扫视，就让我们变得衣衫褴褛，模样难看。

不过西尔维亚仍然请求我们留下，她用撒娇的口吻喊着“爸爸”，然后像唱歌似的吐出一串法语单词。

西尔维亚家的客厅里挂着四姐妹的照片，地下室有一张台球桌和一台制冰机。最大的两个女孩已经离家，去了西尔维亚父亲口中的“大学”。西尔维亚和她三姐各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墙壁漆成了她们各自喜欢的颜色：西尔维亚的是粉红色，她三姐的是浅灰。每次我们前来，她三姐都会回自己的屋里，神秘兮兮，透着些许恶意。有个星期六，她从房间里出来，掴了西尔维亚一巴掌，只是因为她笑得太大声了。西尔维亚捂着脸没作声。“这么笑很没规矩。”她最终说道，“我应该表现得更好。”

“可是你一直都是这样笑的呀。”我们说。

“不总是。”西尔维亚说，“至少在家不行。”

她父母问了我们很多问题：我们的家人是谁？都是干什么的？我们的成绩怎么样？我们的志向是什么？她父亲想了解，我们是否清楚美国黑人的现状？是否明白振兴社会的重担就在我们肩上？他坚信自己的女儿们会成为医生和律师。“成功全都靠父母，”他说，“要不停地、一个劲儿地督促。”

小的时候，有一次母亲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做个大人呗。”我回答。她和父亲听后笑个不停。但在听了西尔维亚父亲的话后，我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板，扬起了下巴。我想告诉他，我要学法律，像你一样。我要寻求真理，绝对的真理。如果真理难求，我至少要学到理——万事万物的道理。但是我的喇叭裤脚破破烂烂，在这栋要脱鞋进入的房子里，我穿的是脚后跟有洞的袜子。在冬日里，由于自己不在意，我的双手和胳膊上总是沾着灰尘。像这样活在世界上，我能有什么志向？西尔维亚母亲的白眼像是在一遍遍地告诉我们：“别做梦了。你们这样的人可做不起梦。”

所以我渴望变成西尔维亚。这渴望如此强烈，以至把恋爱的秘密告诉了她，告诉她我和杰罗姆傍晚有时会在公寓门厅碰面，他的手在我全身上下游走，他亲吻我的嘴唇、脖子和胸口；告诉她我要站在高点儿的台阶上才能够得着他；他每次离开公寓前，要看看屋外有没有大人经过。

西尔维亚的世界看上去精致又陌生：她的父母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同一个家里；每个房间都宽敞而整洁；床总是铺得整整齐齐；书架一尘不染；锅碗瓢盆一律摆放在她母亲所谓的“餐具室”里；光洁的镜子悬挂在梳妆台上方；浴室里散发着家用清洁剂的香味。

她家的面包篮里放着刚出炉的面包，冰箱里放着装在特百惠保鲜盒里的豌豆和米饭，抽屉里摆着叠好的白色及膝袜，衣橱里挂着长裤套装，鞋架上整齐摆放着松糕鞋，钢琴上方挂着海地革命家杜桑·卢维杜尔[注]的画像，而另一幅比夫拉共和国领袖奥朱古[注]将军的画像则挂在两扇悬着天鹅绒窗帘的窗户之间。

在西尔维亚一家的天地里，安吉拉、琪琪和我交叉脚踝，不自然地坐着，突然为自己咬秃的指甲和乱糟糟的头发感到难堪。在这里，我真希望有条头巾，有条拖到地上的裙子。我们感觉自己仿佛偷偷溜进了一场未被邀请的派对。我们担心打碎壁炉台上排列整齐的瓷盘，担心说话的声音太大，担心笑时张着嘴巴。西尔维亚母亲的每一瞥都在提醒我们是多么一文不值。

我们看到在家时的西尔维亚仿佛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而我们自己也试图变成小女孩。

“别表现得像个脏兮兮的黑人一样。”西尔维亚的姐姐说。

西尔维亚被姐姐打过的脸颊泛红，掌印好几天都没有消退。

学习法律。从没有人对我抱过这种期望，从没有人主动对我说："来，学下这个。"所以我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西尔维亚，希望她也能告诉我她的秘密。我悄悄告诉她，自己是怎样渐渐坠入爱河的。起先是因为杰罗姆叫我名字的方式，"奥古斯特"，那呢喃私语，不禁令我感觉到他嗓音中倾泻而下的夏日阳光。

十三岁的时候，我和杰罗姆的关系更进了一步，不只是在黑漆漆的公寓门厅偷偷接吻了。这件事只有西尔维亚知道。把你的未来给我吧，算是回报，我想对她说。我想要你充满希望的未来，好填充我未来的一片空白。

---

1. 多萝西·穆尔（Dorothy Moore，1946— ）：美国著名灵魂乐、福音音乐及蓝调乐歌手，代表作为《蓝色薄雾》（*Misty Blue*）。——编者注
2. 这是《蓝色薄雾》的歌词。——编者注
3. 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1743—1803）：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早期领袖，海地共和国缔造者之一。——编者注
4. 楚克沃梅卡·奥杜梅古·奥朱古（Chukwuemeka Odumegwu Ojukwu，1933—2011）：尼日利亚军人，比夫拉共和国元首。——编者注

10



然而，琪琪是我们中第一个一飞冲天的。一天，一个穿着白色漆皮长靴的女人来到学校，带她去曼哈顿的一家表演艺术学校参加面试。

“各位，”琪琪说，“这是我妈妈。”

“嗨。”我们跟她打招呼。琪琪的妈妈是那么年轻漂亮，让我们惊讶不已，她简直可以登上《乌木》[注]杂志的封面或是《黑玉》[注]杂志的跨页广告。

“嘿，你们好。”琪琪的妈妈说。

琪琪告诉我们，在面试时，她必须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一句台词——“嘿，老爸，你有没有听过……‘耽搁的梦想’的布基伍基乐版本[注]？”

琪琪一遍一遍地跟我们说着台词，她的声音听上去深沉、陌生，站在我们面前的琪琪显得不一样了，仿佛钻进了别人的皮肤。

“他们说我有潜力。有位白人女士说：‘你会成名的。’”

但另一件事情突然发生了——仿佛西尔维亚的父亲在审视着我们，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他所厌恶的一切，我们不再是西尔维亚的好朋友了，只是几个来自贫民区的女孩——一天傍晚，当我们来到西尔维亚家时，她父亲站在门口，对我们说：“今天西尔维亚不能跟你们玩了，她要转校了。”

“回家吧，”他说，“去学习吧。成为比你们现在更好的人。”

我们本可以责怪他用生硬的英语说出这些伤人的话。我们本可以说“去你的！”——成为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属于的那种人。但我们什么都没有说。

我们谁也没有问西尔维亚要转去哪所学校，为什么要转校。他又高又壮，紧皱的眉头间流露出对我们的厌恶。

我们转身离开了西尔维亚的家，在拐角处互相道别，每个人都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为我们的皮肤、头发还有说出自己名字时的样子难为情。我们看着彼此，似乎看到了西尔维亚父亲眼中的自己。于是我们移开了目光，朝家走去。



在课堂上，西尔维亚那空荡荡的座位让我们想起了她的父亲——他双臂抱在胸前，恶狠狠的目光彰显着一种权力。那种权力我们已越来越熟悉，但它不属于我们，我们也并不理解它。

一个星期后，当我们再次看到西尔维亚时，她穿着圣托马斯·阿奎那中学的校服，她姐姐紧紧地搂着她的肩。西尔维亚扫了一眼我们，比了个口型：“一会儿公园见。”我捏了一下琪琪的手，点点头。

那天傍晚，西尔维亚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让它慢慢地在嘴边燃烧，然后又抽了出来。“得卷紧点抽。”她说。谁也没问她是从哪儿弄来的烟卷和温斯顿牌火柴。我们围着她，看着她将烟深深地吸进肺里，停留一会儿，然后吐出来。我们也学着她的样子抽，又浓又辣的烟味呛得我嗓子难受。我们见过十几岁的孩子抽烟，他们经常紧紧地围在一起，闭上眼睛吐着烟圈。我们几个咳个不停，嘲笑着自己的无知，直到欢笑和烟雾仿佛让这世界上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



又到了冬季，安吉拉整天忙着跳舞，琪琪在艺校里演了一次又一次的主角。

我天天看着楼里楼外形形色色的人搬进搬出。珍妮搬走了，住进她房间的卡拉刚来一个月就被警察带走了。接着搬进来的崔尼提是一个身材娇小女里女气的男人，傍晚他说着法语，把一个又一个男人带上楼。

清真寺里的姊妹问父亲："孩子们的妈妈呢？"她们打量着父亲稀疏的小胡子，剪得短短的、浓密的头发，以及宽阔的肩膀。父亲仅剩的八根手指上，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指甲在她们看来，显示着创伤、不完美，以及她们所希望的——需求。

"他们的妈妈去世了。"父亲回答道。

"他们的妈妈去世了。"洛蕾塔重复道。

"瓮里装了什么呀，爸爸？"

"你知道那该死的瓮里装了什么，奥古斯特！"

夜里，我会为父亲的谎言向母亲道歉，向她保证总有一天父亲不会再如此害怕，他会带我们回到田纳西州，回到甜蜜林。我告诉她要耐心一点，有安拉在，一切皆有可能。

---

1. 《乌木》（*Ebony*）：美国时尚娱乐杂志，自创办以来，封面人物一直是非裔美国名人和政客。——译者注
2. 《黑玉》（*Jet*）：美国新闻杂志，创刊于1951年，主要面向非裔美国读者。——译者注
3. 布基伍吉乐（Boogie-woogie）：一种类似爵士乐的黑人音乐。《耽搁的梦想蒙太奇》（*Montage of a Dream Deferred*）是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的诗集，描写了纽约哈莱姆区的非裔居民。他在序言中提到，曾用多种音乐（包括布基伍吉乐）来设计诗歌的节奏。——译者注

11



我们十三岁了，似乎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想占我们便宜的人；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刚刚发育的乳房和正在变长的双腿都会招来垂涎的目光和蠢蠢欲动的嘴唇。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西尔维亚的家人终于出门了，我们三个来到她家。西尔维亚带我们溜进门，一边站着熨天主教学校的校服，一边跟我们说话。

“我来月经了，”安吉拉说，“正在流血呢。”

“终于来了。”我们说。

“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加入我们的队伍了。”我们说。

我们步入了青春期，身体正在发生着改变，但我们还是一样高，还是整天黏在一起。

我们找地方聚头——在闭馆的图书馆楼梯上分享同一支烟卷；跨过地上的跪毯坐在我床上；在皇家比萨店买两块比萨，再切成四份，在那儿你只要买点东西就能坐上好几个小时；公园里的秋千上、手球场上，还有阳光照耀的街角，那里有一家没有窗户的工厂，每天下午五点都有一群面色苍白、满带倦意的女工涌出来。

安吉拉说：“妈妈让我别告诉任何人。”

但我们没必要开口。夏天又来了，到处都是男人和男孩，人群里总

有软绵绵的手搭在我们后背上，总有不肯移开的目光停留在我们胸口，经过陌生人身旁时总会听到他们窃窃私语。他们许诺——要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做什么，为我们做什么。

西尔维亚威胁说要离家出走，她父亲才允许我们待在她家过夜。他说要给我们的父母打电话，确保他们知道我们在哪儿。我们不再看他——垂着眼睛，告诉他家里的电话号码。安吉拉抢在电话拨通前说："我妈妈知道的，不用打了。"目光转向了别处。

跟我父亲通完话后，西尔维亚的父亲说："你爸爸是个好人，他信自己的上帝。人需要自己的上帝。"他瞥着安吉拉那破烂的毛衣和脏兮兮的露出脚趾的袜子。安吉拉把脚缩到了另一只脚后面，弯下身去。然后，他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我们很晚才睡，一边看着情景喜剧，一边吃着冰棒和糖果。西尔维亚和我穿着无袖短睡裙，有一种很轻佻的感觉。我们搂着彼此跳慢舞。安吉拉教我们怎么舌吻，我们花了几个小时练习，直到感觉身体在爆炸。

我们对彼此耳语："我爱你。"这是心里话。

我们说："咱们这样子有点吓人。"然后大笑起来。

当杰罗姆问我是从哪儿学会的舌吻时，我说："不用担心，不必多想。"因为那时他十八岁，我快十四岁，只要听到他说"我爱你"，相信他是认真的，其他的一切就已无关紧要。



有段日子，我们会坐在电视机前看克拉克·肯特和露易丝·莱恩坠入爱河，明白了保守秘密意味着什么(注)。当安吉拉落泪却不告诉我们原因时，我们向她保证我们之间的友谊坚不可摧，告诉安吉拉她有多漂亮。

我们喊着：“开开门，安吉拉。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我们抚摸着她凸出的颧骨，手指温柔地滑过她的双唇。我们说：“你真的很漂亮。不要害怕。不要哭。”

当她翩翩起舞时，我们都太年轻，无法听到她舞姿中诉说的故事。她的背弯成优美的弧形，修长的脖颈扭转着，柔软得不可思议，她双手举在胸前，伸向空中。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们哀求她，“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

然而，安吉拉一言不发。

七月四日[注]，父亲带着我们几个到东河海滨[注]，成千上万的人都聚在那里，看烟火在河面上空绽放。我和安吉拉紧挨着彼此，她在我耳边悄悄说：“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发誓说我们会跟她一起走。

但安吉拉摇摇头，拉直的头发用电热棒烫成蘑菇状，遮住了眉毛和耳朵。她直直地盯着远处的烟花。

“算了吧，”她说，“你们不会的。”

那一晚，纽约以及全国各地都在庆祝独立，目之所及，是一片红、白、蓝色[注]的海洋。我们走进一家拥挤的快餐店，在烟雾缭绕的卫生间里分享了一支大麻，感觉狂放、眩晕、无拘无束。在回家的地铁上，有个乘客提着收音机，播放着《离开爱人的50种方式》[注]，我们几个一边笑，一边跟着唱。

跳上巴士，格斯，你无须考虑太久。

安吉拉点点头：“说得对！”

若是在另一颗星球上，我们或许会成为露易丝·莱恩、泰山的女朋友简[注]、玛丽·泰勒·摩尔[注]或是马洛·托马斯[注]。我们可以把帽子高高地抛向空中，一边转圈一边微笑[注]。在另一颗星球，我们最终可以实现梦想。我们熟悉那些电视节目，那些歌曲。当玛丽被明尼阿波利斯惊得目瞪口呆时[注]，我们会跟着唱起那首主题曲。我们和马洛一起梦想有一天能一夜成名、大红大紫[注]。我们跟“修女飞飞”一起自由飞翔。

但我们还小，还在地球上，朝布鲁克林的家中驶去。

---

1. 克拉克·肯特是超人在地球上的名字。平时他是一名普通的记者，危难时刻就会变成维护正义的超人。露易丝·莱恩是克拉克的同事和女朋友，她起先并不知道爱人的真实身份。——编者注
2. 七月四日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相当于美国的国庆节。——译者注
3. 东河海滨：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区南部。——译者注
4. 红、白、蓝是美国国旗上的三种颜色。——译者注
5. 《离开爱人的50种方式》（*50 Ways to Leave Your Lover*）：美国歌手保罗·西蒙的歌曲，下文那句话也是这首歌里的歌词。——编者注
6. 简（Jane）：电影《人猿泰山》的女主角。——编者注
7. 玛丽·泰勒·摩尔（Mary Tyler Moore，1936—2017）：美国女演员，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演员之一。——译者注
8. 马洛·托马斯（Marlo Thomas，1937— ）：美国女演员、电影制作人、社会活动家，曾获得艾美奖、金球奖和格莱美奖。——译者注
9. 20世纪70年代家喻户晓的情景喜剧《玛丽·泰勒·摩尔秀》中，由摩尔扮演的女主角玛丽有一个经典动作就是把帽子扔向空中。——编者注
10. 明尼阿波利斯是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玛丽·泰勒·摩尔秀》的取景地。该剧讲述了女主角独自来到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追寻梦想。随着该剧的走红，明尼阿波利斯市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该市甚至为玛丽·泰勒·摩尔所扮演的女主角铸了一座铜像。——编者注
11. 马洛·托马斯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主演了情景喜剧《那个女孩》，她所饰演的女主角安从故乡搬到纽约，追寻演员梦。——编者注

12



我在两张陌生的面孔上寻找珍妮的孩子的模样。那个紧紧抓着零食、满脸惊恐的小女孩，以及那个穿着一双不合脚鞋子的小男孩。女人把他俩领走的那一晚，两个孩子哭了大半天。我和弟弟下楼去接他们，发现门被锁上了。“开门。”我们喊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哭声，门却没有开。于是我们上楼回屋，打开了收音机。

他俩就像是从比夫拉战争中走出来的，我们给什么，他们就往嘴里塞什么，似乎永远都吃不饱。同样深色的皮肤，同样惊恐的眼神。这一次他们会被带去哪里呢？

“快开门！”我们喊道，“是我们。我们楼上有吃的。我们可以玩捉迷藏。快开门，我们可以带你们去更好的地方。”

我们不穷，但徘徊在穷困的边缘。



阿兰娜搬到了街对面。她身穿男士西装，经常和她有着绿色瞳孔的女友在公寓门厅跳哈娑舞，圆形的“爆炸头”不停跳跃。她微笑时，先翘起一边的嘴角再翘起另一边，我们四个坐在路边看着她，被迷住了。

晚上，街头打碟师[注]们把拉长的电线插在路灯下面，我们四个循着棕色和白色的电线一路来到公园里的音乐中心。我们看着街区里的男孩在踩扁的纸板箱上跳霹雳舞，当打碟师把史蒂夫·旺达[注]的《公爵先生》放入唱片机时，我们会兴奋地大声尖叫。杰罗姆把我从朋友身边拉

走，黑暗中，伴随着史蒂夫的歌声“他们可以感受到一切……”，我看着杰罗姆跪在我面前，把我的短裤褪到膝盖下方，亲吻着我的身体，直到我从头到脚都开始爆炸。我背靠着手球场的水泥墙，浑身颤抖。打碟师在《公爵先生》放到一半时换了一首我没听过的慢歌，瞬间我感到自己热泪盈眶。这是我答应了洛蕾塔要好好保护的神庙一般的身体啊。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短裤仍在膝盖下面，有那么一刻我捧起杰罗姆的头，他的脸柔软而湿润，紧贴着我的肚子，然后我再次把他推到下面。



气温突破了三十八摄氏度，我们每夜都聚在公园，从早到晚大汗淋漓。安吉拉认识了一个叫约翰的男孩，手指纤细，说话有点口齿不清。西尔维亚的男朋友跟杰罗姆一般大，经常把她从我们身边拉走，躲到手球场后面的黑暗中。琪琪说她爱上了奥斯瓦尔多，去年夏天他哥哥在与“恶魔叛军”的帮派斗殴中丧了命。我们很害怕那些帮派，很害怕那些会把我们街区里的木屋烧成灰烬的大火。但我们有男友，我们有彼此。

我们知道这里以前出过事。在荷兰移民区，有个女孩跑出屋子，睡袍着了火，当她终于跑到安全的地方时，已是浑身赤裸；在霍尔西街，有个消防员抱着两个很小的孩子爬下逃生梯。两个孩子因为害怕紧紧地搂着消防员的脖子，过了好久，他都没法撬开他们的手指，让他们松手。我在报纸上寻找那两个孩子的名字，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珍妮的孩子。

夜深时，我们紧紧靠在男友身上，十指紧扣，身体伴随着音乐慢慢摇动。打碟师在一边喊着：“各位，派对要清场了。”但我们仍然依偎着男友，他们那瘦削的身体就像我们的一样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拜托了。”他们乞求道……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轻声回应：“不行，现在还不行。”



查尔丝特被送走了。她十六岁，是托马斯·杰斐逊学院的啦啦队

长。她拉直的头发梳成马尾辫，抹了发油的刘海儿在额头上卷曲着。一连几个星期，我们向她弟弟打听她的去向。当初整条街都听到了哭喊声。那天早上，我们看到她母亲出门上班时一脸严肃，后背僵硬。“查尔丝特昨晚挨打了。”我们互相说着，“她妈妈把她暴揍了一顿。”

我们大笑起来，对这次挨打的事件讨论了很久，同时把它当成了对我们所有人的警告：只要被抽上一皮带，你就会变成大家嘲笑的对象。我们每个人都牢牢记住了查尔丝特的教训。

“她怀了小宝宝。”她弟弟终于松了口，“她被送回南方了。”

我们拽开男友的手，推走他们，扣上了衬衣。我们知道“南方”是哪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南方”：牙买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波多黎各。在那里，我们很可能沦落到被铁石心肠的单身姑妈或严厉的祖母一手带大，这种恐惧让我们不寒而栗。

“南方”到处都是查尔丝特那样的女孩，十几岁的年纪，挺着肚子，在荒芜的院子里做侧手翻[注]，一群鸡在周围啄食。我们一想到查尔丝特的肚子就胆战心惊，想象着她母亲出门上班时她和男友在一起的情景。他们做了多少次？那是什么感觉？她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们坐在门廊上望着查尔丝特家。我们以为她有一天会回来，怀里抱着一个裹着粉红毯子的婴儿。我们想象她重新回到啦啦队，挥舞着蓝色和金色的花球——“加油，加油，拼尽全力去战斗，上战场，赢一分，上吧，勇士们！”她的马尾辫甩来甩去，刘海儿遮住了眼睛。但过了很久她还是没有回来，于是我们又开始幻想她会独自一人回家，把孩子留给粗暴的姑妈或眉头紧锁的祖母，自己回到布鲁克林。

秋天来了，打碟师们不再往公园里搬音箱了，街灯也不再因为电压起伏而忽明忽暗。我们的男友乞求了一次又一次，每次我们都说“不行”。

查尔丝特的弟弟在布什维克公园玩耍时摔断了两只手臂，它们被打上了厚厚的石膏，交叉着挂在他胸前。“你姐姐回来了吗？”我们问他。他的问答永远是没有。“该死！”我们说，“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父亲果真如我记忆中那样漠不关心吗？他坐在厨房的折叠椅上，头垂在双手上方，摩挲着手上的肿块——那里原本是他的拇指，黑色西裤被一只过烫的熨斗弄出了显眼的褶皱，烫焦的布料闪闪发光，永远也去除不掉。爸爸的两根手指呢？我和弟弟直到十几岁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或许让狗咬掉了。”我们猜想，“或许他的手卡在洞里，他一直用力往外拉，终于拉出来了，可是……”

冬天来了，十二月末的布鲁克林冰雪已深至脚踝。那时松糕靴在纽约很流行，我们几个也穿着及膝的松糕鞋跌跌撞撞地走在街区里，靴子侧面是拉链，什么都好，唯独不防水。我哆哆嗦嗦地度过了冬天，摇摇晃晃，冻得不行，而父亲一直在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那时，他一心专注于信仰，没空去了解十几岁女孩的心思。我和弟弟曾经一度被锁在一扇只能半开的窗户后，而今享受着自己也无法理解的自由。有时傍晚回家，我抬头看到弟弟趴在窗边望着街区，眼神空洞。



圣诞节过后一周，有人发现一个没穿外套的女人死在了布鲁克林的马西区。这儿总是会发现死去的女人——巷子里、地下室里、地铁站台黑暗的角落里。有时候，我们走在街上，会想象自己横尸某处。多久才会有人知道我们死了呢？谁会第一个发问：“你看到奥古斯特了吗？你看到……安吉拉……了吗？”

安吉拉说：“我不知道我妈在哪儿。”她声音沙哑，颤颤巍巍地说着每一个字。我紧紧地抓住她，把她拉到身边。“安吉拉，”我说，“她没事的，她没事的！”

那时西尔维亚和琪琪没在我俩身边，她们退到了别处。整个世界仿

佛陷入了一个悲伤的漩涡，漩涡之中只有我们两个。

“那个女人不是她，小安。我发誓。”

然而，那确实是安吉拉的妈妈。她的大衣左侧口袋里有一张医保卡和一张五美元的食品券。右侧口袋里有一张安吉拉少了门牙的照片，上面用圆珠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安吉拉·汤普森，又名“安吉”(注)，七岁。或许国王郡有人会说：“天哪，我认识那个女人的孩子。”



在我们得知她就是安吉拉的母亲之前，安吉拉在我家睡了三晚，我们俩挤在一张沙发床上，父亲去我的床上睡了。安吉拉的头发散发着汗味和皇冠牌发油的味道，她的呼吸很急促，即使在熟睡时也是如此。窗外有一盏街灯，借着这唯一的一点儿光亮，我注视着安吉拉，在她光滑的脸颊和宽宽的鼻翼之下，我看到了那个女人——她摇摇晃晃地从我们身边经过，瘦削的脸庞，几乎掉光了牙齿的嘴巴，还有那双与安吉拉一模一样的眼睛。

在漆黑的夜里，我看到了屋顶天台上，安吉拉的母亲像胎儿一般蜷缩在严寒中；我看到湖泊；我看到了安吉拉情绪失控地倒在白雪覆盖的地上；我看到父亲与母亲吻别，母亲的床上铺着绸子，《圣经》抵着她的胸膛，细细的金戒指戴在她一动不动的手指上。我张了张嘴想说话，但最终还是闭上了，就这样过了很久，很久。



第三天清晨，父亲跟公司请了一天的假，带安吉拉去了警察局。“这孩子的妈妈应该是失踪了。”他说。

我们从没见过安吉拉的妈妈，但现在看来，我们其实见过她——那个面色苍白的妇人摇摇晃晃地走过我们的街区，试图扶住那个停车标志，却没有扶住时，她不再跳舞，靠向我们，躲开了那个妇人。

当时我们问她：“你怎么了，安吉拉？”我们说：“告诉我们吧。”我们把耳朵贴在她的胸口，听她跳动的心脏……

“她没有死，安吉拉。”我轻声说，“他们一定弄错了。”

几天后当她离开我们时，我们没想过要把她拽回来。我们没有说“等等”，只是说“我们爱你”“明天见”“我们永远是朋友，小安”。我们没有说“别走”，没有说“我们跟你一起走——无论去哪儿。”

我们那时只有十几岁，又懂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懂。

一月来了，西尔维亚整天往返于天主教会学校和她的粉红色房间之间，两点一线，不见人影，被她眼神犀利的母亲和满口梅洛·庞蒂(注)的父亲看得牢牢的。琪琪沉浸在戏剧的世界里，每天排练到天黑。她说她太累了，没力气找我们。

“她没有死，安吉拉。”我一遍又一遍地小声说着，“别相信他们的话。”

但，安吉拉不是我。



“我就住在那儿。”有一年夏天，安吉拉曾指着几条街区外一栋漂亮的红砖房，对我们说道。但我们从没进去过。在那个女人的尸体被发现两周后，西尔维亚和琪琪回到了我身边，我们一起推开了那扇门锁坏了的公寓大门，在信箱边寻找安吉拉的姓氏，但什么也没有找到。“安吉拉住在这里吗？”我们询问这栋楼里进进出出的人。“不，”他们说，“我不认识叫安吉拉的人。”

我们给她打电话，一个提示音告诉我们该号码服务已停止。“妈的，”我们说，“该死！”

“那不是她妈妈，”我告诉西尔维亚和琪琪，“他们搞错了。相信我，我知道。”

我们瑟瑟发抖地等待着，既尴尬又窘迫，我们三个常常陷入沉默。



弟弟已经长高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很敬爱洛蕾塔女士，遵从新的教义，并从我的脸上寻找着蛛丝马迹。

“你没事吧，奥古斯特？”

“没事。”

“真的没事？”

“嗯。”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一天晚上，父亲早已入睡，而安吉拉母亲的尸体在几天前刚被发现，弟弟摇醒了我。



“你过去总说妈妈会来，”他轻声说，“明天，下个明天，或是下下个明天。”

我紧紧闭上眼睛，翻身面向墙壁。

“但是你错了。她不会来了，除非她能复活。”



在田纳西州，每年夏天，坠满盛开花朵的金银花藤都会爬满我们的

院子。每天一大早，我和弟弟都会穿着睡衣赤脚跑到外面，吮吸鲜花的甜香，怎么都不觉得够。舌尖上淡淡的金银花香包含着一种近乎破碎的承诺：在更加不易察觉的地方，藏着更加美好的事物。

“你们这样会生病的。”母亲隔着纱门朝我们喊。门后的她系着围裙，踩着高跟鞋，丰满的嘴唇，深色的肌肤，梳着“爆炸头”，看起来完美无瑕。“让金银花像你们一样自然生长吧。”

她的头发就像一圈光晕。“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注)。”

那时她弟弟克莱德还活着，他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一边抽着“长红”香烟，一边讲故事。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他总是抽烟，而且我们能听到母亲的笑声——她总是这样大笑，说道：“你这是道听途说吧，克莱德！”“后来怎么了？”“我今晚烧鲶鱼，留下来吃饭吧？”

我和弟弟在田野上尽情奔跑，高高的草茎划过我们的腿和脚，火辣辣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我们从未如此自由。布鲁克林是父亲的故乡，他从那里钻出来，而洞口已经逐渐被掩埋。我们只知道甜蜜林以及母亲念给我们的每一则童话故事的相同结局。我们过着属于自己的幸福快乐的生活。



然而，自从舅舅去世后，母亲就经常不见人影。起初，餐桌上一天到晚都空空如也，我每天放学回家，总会看到年幼的弟弟在院子里找甜豌豆和莓果吃，屋里丝毫没有开饭的迹象。几个小时后，父亲回到家中，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食物——罐装汤、罐装通心粉、罐装意大利面和速冻比萨，放在柴火炉上加热。

甜蜜林变成了记忆。母亲变成了尘埃。

“瓮里装的是什么？”

“你知道装了什么。”

“妈妈回家了吗？”

记忆像瘀痕一样渐渐淡去。

“她明天回来，或是下个明天，或是下下个明天。”

“别去湖边蹚水，孩子们。”

“你们的妈妈就是去了那儿，再也没回来。”

那片属于我们的土地沿着草坡一直延伸至湖边，但湖的对岸就不属于我们了，也许母亲忘了走到湖边就应该停下来。

她继续朝前走了下去。

---

1. 打碟师：即DJ，指在酒吧、夜店、音乐节等场所打碟、播放音乐的人。——译者注
2. 史蒂夫·旺达（Stevie Wonder，1950— ）：美国盲人黑人歌手、作曲家、音乐制作人、社会活动家。——译者注
3. 侧手翻是啦啦队舞蹈中的常见动作。——编者注
4. “安吉”（Angel）是“安吉拉”（Angel）的昵称，有“天使”之意。——编者注
5. 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法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知觉现象学的创始人。——编者注
6. 这是基督教的主祷文。——编者注

13



有男朋友的陪伴我们不怕到那些漆黑的地方去。尽管几年前，有个自称“山姆之子”的连环杀手令整个纽约市陷入恐惧，我们还是会去公园黑漆漆的角落里约会。“山姆之子”只杀白人女性，棕皮肤的我们很安全。

然而那一年，在时代广场，很多棕皮肤的女孩死了。虽然我们身在几公里外的布鲁克林，但她们的遭遇仿佛近在咫尺，让我们噩梦不断。那些女孩被人发现时，尸体要么卷在毯子里扔在垃圾桶后面，要么一丝不挂地漂浮在东河上，要么在四十二街色情影院的洗手间里被人割了喉咙。我们十分清楚，跨过那座桥，就到了时代广场那一边的世界[注]。在那里，我们这样的女孩会被皮条客掳走，会注射毒品，余生都会徘徊在纽约的第八大道[注]上，钻进一辆辆停下来的轿车里。这一切甚至比失去安吉拉更令我们恐惧。

“星期一我们就会见到她。”我们说，但她并没有出现。“她会回来的。”乔·威尔森舞蹈学院的老师说，“像她这样天赋过人的孩子肯定会有所成就。”

我们害怕极了。听说安吉拉被送到了长岛[注]的一户寄养家庭里。也许在皇后区[注]？被一位姑妈监管着？或者去了教养院[注]？那时我们才十四岁，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一天夜里，父亲带了一个女人回来，蹑手蹑脚地进了屋。我听到了

冰块在酒杯里的撞击声和轻柔的笑声。雨水哗啦啦地拍打着窗户，潮湿的气息环绕四周。酒已快喝完，我听到冰块碰撞着杯底，轻轻作响。洛蕾塔到哪里去了？我用被子蒙住头，伸手去抓弟弟的手。

早上，床边的跪毯还在，只是已被卷起来放到了墙边。屋外，布鲁克林的天空一片蔚蓝，晴朗无云。孩子们已经在大街上高声尖叫，呼唤着彼此的名字。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客厅，发现那个女人躺在父亲的沙发床上，她拉过被子遮住身体，但我还是看到了她的乳房，她深色的乳头。

“你是他女儿吗？”那女人问。



西尔维亚的父亲早就为女儿规划好了未来。一天上午，西尔维亚的初恋男友上门找她。他个子高高的，棕色皮肤，是隔壁高中的篮球队队长。“请稍等一下。”她父亲说，但是当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把0.22英寸[注]（口径）的手枪对准了西尔维亚男友的胸膛。

“为了女儿，我就算死在监狱里也在所不惜。”西尔维亚的父亲说，声音高昂又柔和，西尔维亚从未听过父亲这样说话。那么高昂，那么柔和，让她无法尖叫。她只能看着，用手捂着嘴，这时她父亲把枪举得更高了，西尔维亚的男友闭上眼睛，哀求道：“求求你，上帝啊，不要这样。”最后她父亲放下枪，说：“回家去，回到你信仰的上帝那里去，别再来我家门口。”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失去了曾经纯洁的宝贝女儿。

“一开始特别疼，”她小声地告诉我们，“但后来就一点都不疼了。虽然没有想象中那么舒服，但真的不疼。”



“求你了。”杰罗姆乞求道。但我说：“不行。只有这件事不行。”夜

里，我听到那个不是洛蕾塔的女人叫着父亲的名字。早上，她套着父亲的睡袍遮住胸部，冲一杯速溶咖啡，坐在我们厨房的餐桌旁抽烟。

“就听他的吧。”西尔维亚说，“他这么好，错过就可惜了。”



“那算了吧，”杰罗姆最后说，“该死。”

忘了我吧(注)。



我坚守着自己的身体，弟弟则坚守着他的信仰，并最终说服了父亲也重新信教。周末他们一大早就出门了，在清真寺里待上一天，天黑才回家，神情严肃，声音轻柔，黑色公文包里装着各自的《古兰经》。

我们的小书架上渐渐塞满了其他的书——《如何为了生存而吃饭》(注)《给美国黑人的讯息》(注)《美国的衰落》(注)。我们在餐桌旁坐到天黑，父亲和弟弟埋头看着伊斯兰民族组织的书籍，而我则一页页地慢慢翻看着课本。突然之间，我迫切地想了解布鲁克林以外的世界，一个比这里更复杂、更广阔的世界。有时候，父亲会试探我，问我几何学、《萨勒姆的女巫》(注)或者苏联的事情。我盯着他，无精打采地耸耸肩，懒得回答。父亲拍拍我的脸颊，嘟囔了一句“有个女人我想让你见见”，又接着看他的书了。我也一头扎回到课本里。否则还能怎样？曾经，我和弟弟坐在窗前，望着这个世界。现在，我们已经融入这个世界之中，努力地打拼着。我为他俩做饭：煎蛋卷和茄子、豆沙派和烤蔬菜、番茄洋葱蔬菜沙拉、烤鱼，还准备了橄榄油。我几乎跟父亲一样高了，那些曾经在科尼岛度过的星期六早已成了往事，从街边小贩那儿买三明治和煮玉米的经历已恍如隔世。

那个女人的办公室很小，有一股麝香油的味道。她戴着黑头巾，面无皱纹、镇定自若，以至从某些角度看上去，她不比杰罗姆大多少。

“你好，兄弟。”她对父亲说。

“你好，姊妹，”父亲轻声回答，“这是我女儿。”

她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张学位证书，上面用粗体字印着她的名字。

父亲离开后，她说：“奥古斯特，我想让你明白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奥古斯特，”她说，“跟我说说你妈妈的事吧。”

Orba是个拉丁语形容词，阴性，意为孤儿的，无父无母的、无子女的、丧偶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有些损失是无法用语言来定义的，语言无法企及死亡的深远。然而，这个拉丁语词汇做到了。Orbus, orba, orbum, orbi, orbae, orborum, orbo, orbis……



从地铁站出来有一条近路，要穿过艾尔文公园，经过那些灌篮的男孩和戴着一只手套的手球队员。许多夜晚，这座公园都会变成派对现场，街灯下的剪影随着音乐起舞，情侣们消失在公园深处的黑暗角落。然而眼下还是早春，打碟师们尚未聚集到公园。我不疾不徐地穿过公园，低着头，脑子里想着星期一要进行的大学预修课考试。

我抬起头时，刚好看到西尔维亚和杰罗姆——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一双小手暖暖地攥在他的手心里。我知道那份温暖，那种牵手的感觉。

“西尔维亚？”

“奥古斯特，嘿。”

“嘿个头。”

当你十五岁时，你的痛苦会超越理性，直刺骨髓。我不知道自己站在那里盯着他们看了多久，只见杰罗姆松开了西尔维亚的手，而她往旁边挪了一步。

“你这是去哪儿？”

当你十五岁时，整个世界会在瞬间崩塌，这种感觉是八岁时的你体会不到的——当你得知母亲走到湖边，却没有停下脚步的时候。

当你十五岁时，你无法再许诺回到从前了。你日渐成熟的双眸在讲述一个全然不同的、更真实的故事。

椴树、蒲葵、常青树、忍冬——这个街区曾是一片森林。如今，每条街都以曾经生长在这里的树木命名。

“这件事的确很疯狂，”西尔维亚说，“我和杰罗姆在一起了。别生气。你们俩已经分手了。我正打算告诉你的。”

“法律呢？”我想问她，“你爸爸呢？”以及那个与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沉默同样宏大的问题：“那我呢？”

地理课本向我展示了这个世界的纷繁复杂。那一晚我趴在课本上，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被布鲁克林以外的世界深深吸引——孟买、加德满都、巴塞罗那——每一个地方，除了这里。

在斐济，为了不让亡者孤孤单单地进入来世，他们的至爱会在这一世被勒死陪葬，一家人来生得以重聚。



“你说过妈妈会来的，明天——”弟弟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对此深信不疑。

1. “那座桥”指布鲁克林大桥，它横跨在东河之上，连接着布鲁克林区和曼哈顿岛。曼哈顿是纽约的中心区域，时代广场即位于此地。——编者注
2. 第八大道是纽约布鲁克林的唐人街。——编者注
3. 长岛：纽约市东南部的岛。——编者注
4. 皇后区：纽约市五区之一，位于纽约东部，长岛西端。——编者注
5. 教养院（Group Home）：为不能居住在自己家庭的儿童、青少年，或生活不能自理的成年人设立的寄养中心。教养院一般最多收容6人，至少有一名护工24小时照看。——编者注
6. 0.22英寸约为0.56厘米。——编者注
7. 杰罗姆的原话是“Forget you”。这是一句美国俚语，有“该死”“算了吧”之意，字面意思为“忘了你”。——编者注
8. 《如何为了生存而吃饭》（*How to Eat to Live*）是伊斯兰民族组织领袖伊利贾·穆罕默德于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一套书，讨论健康饮食哲学和黑人穆斯林的规定饮食。——译者注
9. 《给美国黑人的讯息》（*Message to the Blackman in America*）：伊利贾·穆罕默德的著作，主要讨论了什么是上帝，谁是上帝，宗教概念与自然和数学之间的区别，以及人类、恶魔、天堂与地狱的起源。——译者注
10. 《美国的衰落》（*The Fall of America*）：伊利贾·穆罕默德的著作，讨论了伊斯兰教教义的过去和未来，追溯美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包括美国人对曾经的奴隶的所作所为，指出这正是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译者注
11. 《萨勒姆的女巫》：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的代表作，描写了15世纪美国萨勒姆镇的一起迫害“行巫者”案件，影射麦卡锡主义的恐共疑云和政治迫害。——编者注

14



“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妈妈已经死了？”索尼娅女士问我。

窗外，我看到树木整齐地排列在格林堡公园。那是个温暖的晴天，春天刚刚开始。她办公室的窗台上垂着一串常春藤，绿叶顺着窗台整齐生长，又往下蔓延。窗户上安着防护栏，尽管办公室只在七层。以前有人从索尼娅女士身边跑过，纵身跳下吗？

我抬头看她。“你为什么认为我妈妈已经死了？”



三个月之后，我再次见到了西尔维亚。她穿着校服，隆起的肚子顶着衬衣纽扣。她在街对面向我招手，我们之间隔了一条双行道。

“奥古斯特！”

但我正在离开布鲁克林，我的心已不在这里。



那是我埋头读书，不见人影的一年。那是塞满了大学预修课和SAT预考(注)复习的一年，努力迈向那个新奇的、陌生的、叫作常春藤联盟的东西。因为布什维克曾经是一片森林，因为我们被叫作贫民窟女孩——即使我们很美丽，挽着手，穿着印有我们名字和星座图案的T恤，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我从高高的书架上取下了放在那里的瓮。它一直放在那里，久到我

记不清。我掀开盖子，朝里面看去。



母亲走进了水里。

我把瓮搬到我俩的房间里——如今我还与弟弟同住——放在我的床头柜上。整夜，我都把一只手放在瓮上。

地球上百分之七十都是水，难免不走进水里。



琪琪参演了话剧社的《耶稣基督万世巨星》，得到了玛丽亚·玛格德尔妮的角色[注]。演出前一晚，她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要坐在第一排看她表演，尽管那个位子挨着西尔维亚。“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琪琪劝我，“他们已经有宝宝了，再说你也不想跟那个男孩好了。”她说她会用外套另占一个位子，因为安吉拉有可能会回来。

“我们还像从前那样好，可以吗？”琪琪问，“就算是为了我？”

但是那晚，穿上外套时，我不由得停了下来，想起了西尔维亚的肚子，那个骨灰瓮，还有曾经冲我眨眼的前任男友。我坐在床边，想起甜蜜林田野上的奔跑、克莱德舅舅的笑声、母亲枕头底下的刀、还有洛蕾塔来回擦着厨房地板的双手。

我坐在那里，公寓里静悄悄的，穿着外套的我感觉越来越热。我一直坐在那里，直到演出已结束很久。

琪琪那天嗓音颤抖。在唱《我不知道如何爱他》的最后一段时，她的破音响彻整个礼堂。“所有人都笑了，”后来我听人说，“整个礼堂，人人都在笑。我们不是故意要嘲笑她，我们不知道……”

西尔维亚那天没去，琪琪的母亲也没去。琪琪为我们占位子的那几

件外套一直留在空空的座位上，直到演出结束后，剧组的同学拿走了他们的外套，只留下了她自己的那件。

往左走两步，往右走两步，往前走两步，或者往后走两步，你就置身于自己的生活以外。

有个朋友的朋友当时住在切尔西酒店，剧组在酒店十一层办了派对。

有谁看到了琪琪纵身一跃，如鸟儿一般飞翔？

那一年，琪琪长发及腰。大多数时候，她都把长发编起来盘到头上。但演出那晚，她把辫子散开，让头发披散在肩上。在切尔西酒店的派对上，她的头发是否在夜空中张开，像一双黑色的翅膀？她是否真的相信十五岁就是生命尽头？

如果斐济的部落要活人陪葬，那我也应该跟她一起飞翔，或者是安吉拉。但我们还留在地球上，相信自己并没有翅膀。

---

1. SAT预考：Preliminary SAT，简称PSAT。SAT是美国高中生升入大学必须通过的测验，相当于我国的高考。PSAT是SAT考试前的热身赛，更是对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角逐。——译者注
2. 《耶稣基督万世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是一部摇滚音乐剧，以耶稣的生平事迹为题材。剧中耶稣被人性化处理，给人更亲切的感觉。玛丽亚·玛格德尔妮是耶稣的追随者，也是耶稣的妻子，她追随耶稣修道，并成为有名的圣女之一。——译者注

15



我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下了公交车，孤身一人。这正是我想要的——独自走出布鲁克林，没有过去，只有现在和未来。

“奥吉[注]。”入学第一天，我纠正了教授，“我的名字叫奥吉。我考来这里，是因为我从小就想对死亡和垂死的人有更深刻的了解。”

“简直太疯狂了。”一个白人男孩扭头对我说，“我跟你一样。”他后来成了我的第一位情人，他的皮肤是那么苍白，我几乎可以看到下面蓝色的血管。

该如何开始讲述你自己的故事呢？第一次听到芝加哥艺术团[注]的歌时，我脱口喊出了琪琪的名字。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呢？罗斯科·米切尔吹着萨克斯，莱斯特·鲍伊吹着小号，磕磕绊绊地，号、鼓、铃声汇成优美的音乐，给这个世界带来无数美好，几乎令人忘记了呼吸。西尔维亚那满口哲学的父亲怎么会错过了这些？我那深陷悲伤不能自拔的父亲怎么不知道这些？不知道这世上有人与他经历相似，能够倾诉他的故事？而当初，跟着洛·史都华[注]、塔瓦雷斯合唱团、休斯乐团一起歌唱的我们，怎么没有把收音机调到塞西尔·泰勒[注]、奥奈特·科尔曼[注]、迈尔斯·戴维斯[注]的音乐呢？

当我们彼此依偎在对方的胸口时，怎么没有听到卡门·麦克雷[注]的歌声？当安吉拉握紧拳头时，比莉·荷莉戴[注]就从我们身旁经过，而我们却不知道她的名字。尼娜·西蒙用歌声诉说我们有多么美丽，而我们却没能听见她的声音。

二十几岁时，我整天和白人男孩们走进一间又一间墙壁上没挂照片、充斥着爵士乐的旅馆房间，和他们睡觉。每当我把他们的头推到身下时，我就想起了布鲁克林，想起了杰罗姆、西尔维亚、安吉拉和琪琪。我在棕皮肤男孩的咒骂声和鲍伊[注]悲恸悠扬的小号声中，放声尖叫。每当我和他们上床时，都紧闭双眼，不去看那些我从小就相信的属于魔鬼的脸。我幻想自己又回到了家里，闺密们再次围绕在我的身边，我们尽情欢笑，四个人都还活着。

在菲律宾，一个英俊的棕皮肤男人用双唇一遍遍亲吻我的脚，说：“每次都要从这里开始。”在威斯康星州，我对起初是室友后来成了我情人的女人许诺，我会永远和她在一起。几个月后，我已通过答辩的毕业论文散落在房间地板上，我亲吻着她睡梦中微微张开的唇，然后在深夜离开了。在巴厘岛，我在夜里等待一个帅气的黑人男人从底特律赶到我身边。“快说啊。”他乞求道，我们的身体饥渴地交缠着彼此，放声大笑，“不过就是那该死的三个字罢了。”

刚满三十岁那年我在韩国，我以为自己怀孕了，哭了整整一个星期，后来知道自己没怀孕，又哭了一星期。背景音乐是艾比·林肯[注]演唱的《这是魔力》，我好像又和弟弟站在了公寓高高的窗口，俯瞰我们的街区，孩子们在楼下玩耍。

曾经，在旧金山的一家咖啡馆里，那个和我一起同居了八个月的女人问我睡觉时为什么握着拳头。

“我有吗？”

“嗯，有啊。”她说。

曾经，我几乎就要说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妈妈还没有死。”但终究没说出口。

1. “奥吉”（Auggie）与“奥古斯特”（August）发音近似。——译者注
2. 芝加哥艺术团：美国爵士乐团。下文提到的罗斯科·米切尔、莱斯特·鲍伊都是该乐团的成员。——编者注
3. 洛·史都华（Rod Stewart，1945— ）：英国摇滚歌手。——译者注
4. 塞西尔·泰勒（Cecil Taylor，1929— ）：美国黑人钢琴家、诗人、自由爵士乐先锋。——译者注
5. 奥奈特·科尔曼（Ornette Coleman，1930—2015）：美国爵士乐萨克斯手、小提琴手、小号手和作曲家。20世纪60年代自由爵士乐运动的主要创新者。——译者注
6. 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1926—1991）：美国爵士乐小号手、乐队队长和作曲家，是爵士乐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译者注
7. 卡门·麦克雷（Carmen McRae，1922—1994）：美国爵士乐女歌手、作曲家、钢琴家和演员，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爵士乐歌手。——译者注
8. 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1915—1959）：美国黑人女歌手，爵士乐坛的天后级巨星。初有名气的她因为肤色一直受着不平等的待遇，以致她吸毒，入狱、酗酒。经过十年鼎盛期，1950年她开始走下坡路，并于1959年离世。——译者注
9. 鲍伊：指前文提到的芝加哥艺术团成员莱斯特·鲍伊。——编者注
10. 艾比·林肯（Abbey Lincoln，1930—2010）：美国爵士乐女歌手，20世纪60年代开始，她成为争取黑人人权的音乐文化斗士。——译者注

16



我十六岁那年的秋天，父亲带我们回到了甜蜜林小镇。我们坐火车到了田纳西州，然后租了一辆车，开了一小时，到达我们曾经居住过的那片土地。绿叶已渐渐转黄，但空气依旧闷热。我们是在傍晚抵达的。我和弟弟甩开车门冲了出去，像是又回到了童年，沿着通往家门的长长的土路奔跑着。然而，那片过去曾是我家所在的地方已经长满了比我们还高、像竹竿一样粗的野草。站在老房子前，我闻到了咸咸的湖水的味道。我们静静地站在那儿，在寂静中，可以听到湖水轻轻拍打湖岸的声音。我牵起弟弟的手，默不作声地走向湖边。四周的树干上都钉着橙色的警示牌，上面写着“私人领地，禁止入内，切勿穿行”，但我们没有停下。湖水的颜色很深，在色泽明亮的树木的映衬下，近乎黑色。

“你什么时候才意识到你妈妈其实已经死了？”几个月后，索尼娅女士再次问道。

从未意识到；每一天都意识到；昨天；此时此刻。

“爸爸带我们回到湖边的那一天。”

我可以听到父亲走过来的声响。即使是在这儿，布鲁克林已远不可及，他的脚步却依然那么轻缓。

在离开湖边时，我看到有个人坐在独木舟上，慢慢地划过一排松树。湖水最深处有二十英尺。“我只是把脚趾放进了水里。”母亲会这么说，“我想要感受一下水浸过脚面的感觉，仅此而已。待在离它近一点的地方。”



父亲的葬礼后，在那家小餐馆，弟弟突然问道：“你当时为什么总是那样说？总是告诉我她明天会来，或者下个明天，或者下下个明天？”

我久久没有回答，最后终于说：“因为我相信那是真的。我相信总有一个明天，她会来的。”

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边的某个地方，一群被奴隶捕手抓回来的伊博人[注]，纵身跳入水中。他们相信既然是海水把他们带到了这里，那么海水也能把他们带回家。他们相信投海回家要比被奴役的生活好上千百倍。



再次看到安吉拉，是我在布朗大学念大一那年。星期五的晚上我坐在房间里，即将要与我过夜的男孩把头枕在我的大腿上，而她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皮肤比我记忆中的更黑了，头发又长又直。但她的脸庞还是那样，有棱有角，美丽如初。那部电影讲的是一个舞蹈演员努力想出演《仙女》[注]女主角的故事，她被未婚夫抛弃了，人生经历正好是舞剧的真实写照。舞台上的安吉拉是那么惊艳，她比我记忆中更瘦了，但更有力量、更灵活了。当她转向镜头时，我不禁喊出了她的名字。

“安吉拉！”

那个男孩问我是否认识她。

“她很性感。”他说。

“安吉拉，”我喃喃自语，“你成功了。”



父亲站在我和弟弟的身后，说该回去了[注]，但我们谁都没有挪动脚

步。

起风了，树叶在沙沙作响。那个划独木舟的人停了桨，往水中抛了条钓鱼线。他是在钓鲈鱼吧？或许是鲑鱼，又或是鲶鱼，我不确定。

一切已是记忆。

我看着湖水来来回回地轻拍湖岸，太阳开始落山。我牵起弟弟的手，紧紧握住。在田纳西州我们没有任何亲人了，我们将在旅店里住一宿，到别处买点纪念品。明天黄昏，我们会再次开着租来的车，踏上返回布鲁克林的漫漫旅途。

我抬头看着正在变黄的树叶，心想其实在某一刻，我们都在回家的路上。在某一刻，这所有的一切，一切的事、一切的人，都成了记忆。

---

1. 伊博族：西非主要黑人种族之一，主要居住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编者注
2. 《仙女》（*La Sylphide*）：著名浪漫主义芭蕾舞剧，讲述年轻的农夫在结婚的前一晚被仙女吸引，随她而去。——编者注
3. 原文为“move on”，也有“忘掉过去，继续前行”之意。——编者注

后记

创作一部小说意味着回到过去，重拾当初的期望与幻想。这是一段情绪激荡的旅程，有时小说中人物的言行并不如作者所愿。经常有人要我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我答不上来——当我沉浸于小说中时，这一切都说得通。然而，一旦从自己创造的世界里走出来，我发现自己很难再重回那条在创造人物之前曾走过的路。我猜从很多方面来讲，作者笔下的人物们其实一直都存在于“某个地方”。

在我还没有开始创作奥古斯特、琪琪、安吉拉和西尔维亚的人生时，很久以前，我就在思考对于这个国家的女孩来说，成长意味着什么——我不断地回忆着、想象着，就如诗人里尔克所言：“这个伟大而充满预见的时刻，这些石头的觉醒[注]。”因此，虽然《另一个布鲁克林》是一部小说，但在写下它、让故事渐渐丰满起来的这些年里，我都生活在书中人物的身体里，不断地追问自己他们每个人的生存与命运——谁成功了？谁没有？谁活下来了？他们穿什么？做什么？说什么？他们的头发有多长？故事开始时他们多大，结束时又是多大？他们会爱谁？他们会如何离我们而去，又会留下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故事想要阐述什么？

我知道，当小说在纸上成形时，故事中人物的生活很难不与作家本人的生活纠缠在一起。当我们展开这些角色的故事和活动时，很难不去展开自己的过去。在《另一个布鲁克林》中，我回顾了自己的青春岁月，不断地挖掘，重新找回我与年少时好友间的深厚情谊，初恋时的怦然心动、欣喜若狂和患得患失，对于生活的强烈意志，以及童年即将终

结时那迟缓却强烈的痛楚。

在创作《另一个布鲁克林》之初，我想写的是年轻人之间的亲密纽带，以及这些细节背后的种种寓意。我想把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布什维克——我童年时生活过的，曾经无比熟悉的地方。

作家写作的目的就是传递和延续。我想让自己童年时期的布什维克重现纸上，被人铭记。于是我塑造了四个迷人而陌生的女孩，与童年时期的我大不一样，然后把她们安置在那个无比熟悉的街区里。

我不知道奥古斯特、西尔维亚、安吉拉和琪琪会做什么、怎么做。我不知道她们谁会活下来，谁不会。我还不知道在小说结尾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或是我希望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我写作时心怀希望，渴望她们能生存下来。我带着那些问题写作，仿佛能用文字耕耘，收获它们的答案，变得越来越清醒、思路清晰。

现在的我是否了解了更多事？关于少女时期？身为一位充满活力、引人注目，受人喜爱的黑人女性意味着什么？坚守一份爱情，又迅速地放手意味着什么？我是否对此有了更多了解？我想是的……

《另一个布鲁克林》带我走过了一段旅程。当我终于从案前的手稿中抬起头时，我年长了一些，也成熟了一点，变得更有思想，同时无比感激那群在写作时给我以支持的女人：我的搭档朱丽叶·维多夫，以及那些与我亲如手足的姐妹——琳达·维拉罗莎、亚娜·韦尔奇、托希·里根、鲍勃·阿洛塔、安·纳、切尔·威廉斯、南希·保尔森、凯瑟琳·西本、柯比·金、夏洛特·谢蒂、简·塞西恩、雅伊梅·莱茵斯、欧黛拉·伍德森……还有很多很多人。

感谢我的“非亲兄弟”——艾勒里·华盛顿、尼克·弗林、克里斯·迈尔斯、克沃密·亚历山大、贾森·雷诺兹……同样，还有很多很多人。

这本书的问世，同样离不开我曾经的同事们——唐纳德·道格拉斯、迈克尔·缪伯恩、和山姆·奥卡西奥和玛丽亚·奥卡西奥夫妇、埃米利奥·哈里斯和蕾妮·哈里斯夫妇、索菲娅·弗格森、帕特·黑思。

特蕾西·谢罗德和罗斯玛丽·博特姆帮助我将这部小说润色得更入人心。感谢你们。

长日将尽，作家孤身一人，唯有故事陪伴，思考着人物和故事背景，以及如何点亮或淡出某一个画面。故事的深意常常从身边溜走，有时文字自然而然地从我笔端涌出，有时又毫无灵感，不由得诅咒起缪斯女神。然而一路走来，我每天都活在深切的感恩中。

杰奎琳·伍德森

---

1. 这句话出自里尔克的德语诗歌《回忆》。——编者注